

趙元任 張太雷

劉海粟 盛宣懷 李札

華羅庚 惲代英 周有光

莊存與 瞿秋白 洪深

# 辛亥革命中的

# 常州人

主編◎徐纓



蕭道成 蕭衍 蕭統  
陳濟 唐荆川 惲南田  
段玉裁 呂思勉  
阿甲 姜椿芳 陶魯笳

鳳凰出版傳媒集團  
鳳凰出版社



# 编委会

辛亥革命中的常州人

The Changzhou People in the Revolution of 1911

主任：徐 纓

委员：丁 一 汤继荣 周晓东

罗志平 虞建安 陈吉龙

主编：徐 纓

副主编：丁 一 汤继荣 周晓东

江山代有才人出  
各領風騷數百年

清代常州詩人趙翼

# 目录

辛亥革命中的常州人

The Changzhou People in the Revolution of 1911

序 .....	1
 “民国产婆”赵凤昌 .....	1
 民国国士吴稚晖 .....	9
 江苏代理都督庄蕴宽 .....	17
 江西首任都督吴介章 .....	27
 湖北新军教头吴殿英 .....	35
 《苏报》馆主陈范 .....	42
 舆论先锋汪文溥 .....	50

# 目录

The Changzhou People in the Revolution of 1911



新政体的推动者孟森 ..... 58



公民意识的启蒙人孟昭常 ..... 68



新闻革命的先贤狄平子 ..... 82



“千军难御”的徐血儿 ..... 90



报界女杰陈撷芬 ..... 98



革命斗士何士准 ..... 105



不惜生命之贵的钱化佛 ..... 113



# 目录

辛亥革命中的常州人

The Changzhou People in the Revolution of 1911



现代教育首倡者蒋维乔 ..... 121



社会教育先驱伍达 ..... 129



民主革命义士朱稚竹 ..... 135



常州光复第一人屠寄 ..... 142

后记 ..... 149

# 序

一百年前，古老的神州大地上发生了一场伟大的革命——辛亥革命，它推翻了清皇朝的统治，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争取民族独立解放的斗争进入新的历史阶段。

辛亥革命汇聚了当时中国社会各阶层的精英，这其中，一群来自常州的仁人志士尤为耀眼。在中国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他们心系中华，勇立潮头，敢为人先：办报办刊，宣传新思想，为革命进行舆论准备；训练新军，培养骨干，积蓄革命的军事力量；策划南北和谈，谋建共和政府、策动清廷退位；举办新式学堂、新式农会，唤醒大众，培育革命的社会基础；谋划推动立宪活动和地方自治，为革命光复进行组织准备；参与江苏光复和攻克南京等等。他们为辛亥革命的胜利作出了彪炳史册的贡献，是常州人民的光荣和骄傲。

先贤们在革命中表现出的精神，是值得我们永远学习和传承的。一是求新求变的改革进取精神。从“戊戌变法”至辛亥革命，推动中国社会变革的思想渊源有不少发端于常州学派（也称今文经学），而常州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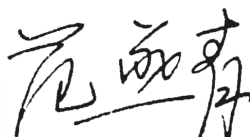
派的精髓就是经世致用、变法改制。在这一思想传统的影响下，常州人面对国家衰微而心怀变革之意，他们放眼世界，虚心向世界学习，向革新学习，积极寻找一条救国救民之路。二是敢作敢为的大无畏精神。他们勇于担当历史重任，敢想、敢试、敢干、敢闯，传播革命思想，培养革命力量，参与军事斗争，为国家为民族倾尽全力。三是为国为民的无私奉献精神。在国家民族危难之际，他们放弃高官厚禄、一隅书斋、殷厚实业，倡大义、举大事；革命胜利，他们不求官位利禄，功成身退，甘当为国尽责一公民。

辛亥革命开启了百年强国之梦。百年来，在常州这片热土上，一代代优秀儿女励精图治，奋发图强，开拓创新，铸就了世人瞩目的辉煌成就。常州从一个江南水乡的工商小城发展为经济发达、文化繁荣、群众富裕、民生发展、人居环境优美的幸福之城、创新之城、文明之城。欣赏今日之常州，更令我们怀念辛亥常州英烈们，是他们与中华民族的先烈们一起，为我们开辟了一条光明的路，是他们留下的宝贵精神，鼓舞和激励着我们不断地锐意进取、开拓创新、勇往直前。

纪念，绝不仅仅是为了铭记历史，更重要的是为了

牢记历史给我们的教育和启迪，继往开来。今天我们重拾辛亥记忆，就是为了建设更加美好的常州。常州已进入率先实现基本现代化的发展新阶段，我们将以更加创新的思维、更加开拓的精神、更加开阔的视野、更加宽广的胸怀勇于创先争优，集中力量实施科教与人才强市、创新驱动、城乡一体化、经济国际化四大战略，续写常州科学发展新辉煌，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出常州人应有的贡献！

中共常州市委书记



2011年8月

## “民国产婆”赵凤昌

辛亥革命时期，上海南阳路10号“惜阴堂”住着一位老人，他深居简出，但与当时的政要人物袁世凯、唐绍仪等多有往来，与立宪派张謇、程德全等关系密切，与革命党人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章炳麟等过从甚密。“惜阴堂”成为各派人物聚会之所，许多左右时局的大事都在这里谋定，特别是南北议和等多项重要议题讨论常在这里举行。“惜阴堂”主人从中积极斡旋，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位在推翻帝制、建立民主共和中被誉为“民国产婆”的“惜阴堂”主人，就是常州人赵凤昌。

赵凤昌，字竹君，1856年出生在常州一个没落的望族家庭。赵凤昌早年科考不成，便在朱氏钱庄当学徒。钱庄经理觉得他是个人才，将来能成大器，为他捐了一个县丞官衔，被派到了广州，很快得到两



赵凤昌

广总督张之洞的赏识，当了张之洞的机要文案，后又随张之洞到湖广总督任上。

由于赵凤昌长期跟随在张之洞身边，对张的一言一行了如指掌，揣测心理十不离八，摹仿张之洞笔迹代拟公函几可乱真，时间一长便遭同仁忌妒。后来有人弹劾张之洞，朝廷以赵凤昌“揽权”为由，把他革职永不叙用，使张之洞逃过一劫。张之洞知道赵凤昌是因自己而丢官，因此对他格外关照，不仅替他向盛宣怀讨了一个武昌电报局的挂名差使，而且还派他驻上海办理通讯运输业务，实为张的驻沪办事处。由此，赵凤昌便带着一家老小来到了上海。赵宅不仅是张之洞搜集内外信息的基地，也是湖北省派往海外留学生的中转站。

### 冒险抗旨策东南互保

赵凤昌到上海后，深知腐朽的清王朝气数已尽。因此，他便尽一己之力为社会进步四处奔走。

1900年，义和团运动在京师形成高潮，赵凤昌预见到义和团与八国联军的战火会破坏中国南方经济的发展，为中国将来的前途考虑，他把清廷与各国宣战的诏令视作“矫伪”，以湖广总督张之洞代表的身份与盛宣怀、何嗣焜（两江总督刘坤一代表）、恽祖翼（浙江布政使、浙江巡抚代表）等几个常州同乡一起，联合东南

各省督抚与各国在沪领事签订互保条约，积极策划推行东南互保，使长江流域经济中心免受了战火的蹂躏。后来，他还试图与张謇一起将慈禧与光绪从北方迎至南京或汉口，然后强迫慈禧交出政权。但是，由于张之洞、刘坤一二督与西太后之间并无根本矛盾，加之西太后很快向列强投降，使他们之间的矛盾缓解，赵凤昌等人的计划遂成泡影。之后他又和孟森、孟昭常等常州人联合张謇等积极宣传更张政体实行立宪。当看到清廷只是把立宪作为一个幌子之后，赵凤昌开始明白，要想救中国必须另谋出路，这正是他与孙中山等革命党人联合的思想基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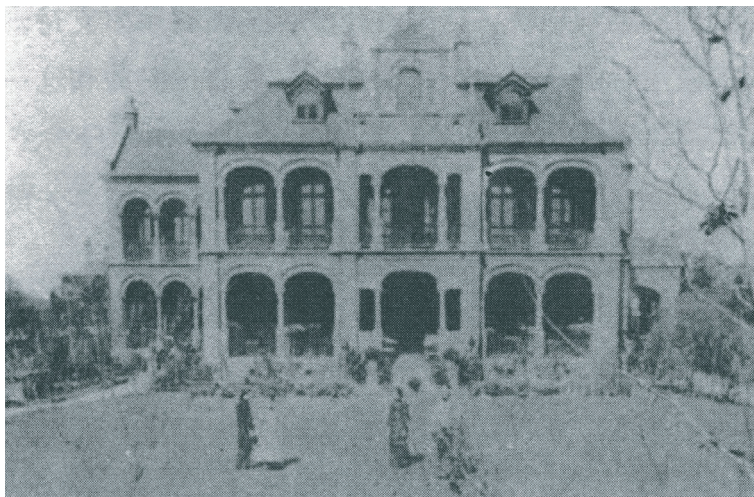
### 总揽全局聚各方精英

辛亥革命爆发时，孙中山正在海外募集革命基金，国内的革命党人各自为战，革命缺乏一个统一的领导。宣布独立的省份，政权纷纷落入了军阀、官僚、政客、立宪党人的手中。袁世凯凭借他的地位和武力成为封建王朝和外国列强进攻革命的新工具。革命形势风云变幻、错综复杂。政见上超越南北党见的赵凤昌，思路开阔、智谋超群，对南北形势判断精确，常出奇策，成为掌控各派政治力量博弈、妥协、合作的核心人物。

武昌起义不久，赵凤昌即拟订政见五条：保全全国

旧有疆土，以巩固国家之地位；消融一切种族界限，以弭永久之竞争；发挥人道主义，以图国民之幸福；缩减战争时地，以速平和之恢复；联络全国军民，以促共和之实行。此确为老成谋国之金玉良言。为实现此五条，赵凤昌等仁人志士进行了不懈努力。

武昌起义消息传至上海，赵凤昌即邀集张謇、庄蕴宽及同盟会会员黄炎培、立宪派人物雷奋、孟森等到



位于上海南阳路10号的“民国产房”惜阴堂

“惜阴堂”会商应对之策。上海光复，赵凤昌又与张謇居中调停，“惜阴堂”成为南北方代表幕后商议的地点，并约定在上海，由江苏代表雷奋致电各省派代表前来讨论“将来国体、政体根本计议”。

1911年秋冬之际，孙中山从美国取道欧洲、香港回

国，12月25日到上海。他首先与同盟会黄兴、宋教仁等商讨组建政府诸事，次日即拜会赵凤昌。

赵凤昌的女儿赵志道从阳夏战争前线“乘船返沪”，见到一个颇有历史意味的场景：“先君已除辫，终日与各方人士讨论国事。座上客有章太炎、孙中山、宋教仁、戴天仇、张季直、庄思缄、汤蛰仙等。所议为电请清帝退位及劝袁世凯赞助民国等事。南北议和时，先君常去观渡庐与伍廷芳策划和议条件。闻五色旗寓五族共和意，嘉禾国徽寓以农立国意，皆出先君倡议。”

赵凤昌是桥梁是纽带，他聚集起江浙沪士绅与孙中山、章太炎、宋教仁、戴季陶（天仇）、张謇（季直）、庄蕴宽（思缄）、汤寿潜（蛰仙）等人商议创建民国的大政方针，又与湖北军政府及袁世凯、冯国璋的北洋势力交相往还，并同外国使团反复沟通，竭力预防列强干涉，促成清帝退位，从而对辛亥首义后中国政局的走势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 纵横捭阖促南北议和

南北议和在英租界市政厅举行，但双方讨论和争议的有关停战、国体和召开国民会议等问题，却都是安排在“惜阴堂”里进行的。就连1912年1月中旬，南北双方协议清帝退位后由袁世凯任大总统的密约也是在



“南北议和”场所——上海英租界市政厅

这里议定的，这一切赵凤昌都积极参与其中，并不时地提出一些两全之策来化解双方的矛盾。比如，南北议和到了最后关头，双方在讨论袁世凯接任临时大总统后第一任内阁问题时，同盟会坚持内阁总理必须由同盟会员担任，总理通过之后，再由总理提出阁员全体名单，请参议员投票，袁世凯拒不接受这样的安排。双方互不让步，僵持多日。赵凤昌是幕僚出身，最能揣摩各人心理，他觉得唐绍仪对此问题十分为难，便插言道：“我是以地主的资格列席旁听的人，不应有什么主张。但现在对内阁问题，我有一个意见，可以贡献诸君以备参考。我认为新总统的第一任内阁，是新旧总统交替的一个桥梁，所以这国务总理必须是孙、袁两位新旧总统共



同信任的人物。我以为只有少川（唐绍仪字）先生最为合适，只要孙、黄两先生不反对，我很想劝少川先生加入同盟会为会员，这就是双方兼顾的办法。”赵凤昌话音刚落，孙中山、黄兴同时鼓掌，表示欢迎唐绍仪加入同盟会，同时即决定请唐绍仪出任国务总理，这个问题就这样圆满解决了。后来，双方在讨论陆军总长人选时又发生争论，黄兴和段祺瑞都争当此职。最后，还是赵凤昌提出了一个调和方案：即让段祺瑞任陆军总长，而黄兴当陆军参谋总长。如此化解了双方的矛盾。

南北议和结束后，赵凤昌因调停有方，南北双方均感到他是一位难得的人才。1912年2月9日，孙中山专函聘请他为枢密顾问。不久，袁世凯又专电邀请他赴京担任顾问。但此刻的赵凤昌已无意在仕途履险，对双方的盛情邀请都辞而不就。他不谋官职甘当布衣，直至1938年在上海去世。

《赵凤昌藏札》共109册，原藏在国家图书馆，近年来正式面世。对南北要人的大量机密函电进行仔细梳理，可以发现许多鲜为人知的秘密，足见赵凤昌在南北议和与建立民国过程中所起的决策作用。然而赵凤昌为人低调，处事谨慎，对机密讳而不谈。加上国民党修民国史有意无意排除本系统之外人士的历史作用，后来诸

学者的辛亥革命史又重在表述革命党的活动，文献材料尚未披露等原因，知道这些秘密的人并不多。当代历史学家冯天瑜教授研究后认为，赵凤昌等常州系人士在武昌首义——民国创立这一历史关头，心忧天下，超越党派，运筹帷幄，大处着眼，实处着手，且始终与历史前进的大方向相切合，诚古今中外罕见之布衣谋略大师，称之为“民国诸葛”颇为恰当。



赵凤昌藏札

## 民国国士吴稚晖



吴稚晖

他出生在一贫寒家庭，却成为中华民国孙中山、蒋介石、蔡元培等高级政要的挚友，也是周恩来、李立三、聂荣臻、陈毅、邓小平等在法国求学时的中法大学校长；他曾留学日本、英国、法国，学贯中西，是民国时期国家学术最高机构中央研

究院的首任院士；他坚定爱国、生活淡泊、致力教育，赢得了世人的崇敬，生前就被国际联盟聘任为国际文化事业协进会会员，享受国际文化学术界最高荣誉；身后又被联合国文教组织列为世界百年文化学术伟人。他就是有“一代国士”之誉的吴稚晖。

吴稚晖，1865年出生于常州武进雪堰桥。吴家历代以种田为生，家境贫困。吴稚晖6岁时，年方25岁的母亲病故，下葬时只能在身下垫衬稻草。外祖母可怜他，把他带到无锡抚养成人。吴稚晖7岁进私塾接受启蒙教

育，天资颖特，学习刻苦。1882年18岁的吴稚晖应聘担任私塾教师，1887年吴稚晖考中秀才，后参加乡试中了举人。甲午战争战败，吴稚晖逐渐意识到，中国要学习西方工艺造大炮机关枪才能抵抗敌人。1901年3月，吴稚晖携家眷赴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堂留学，立志研究科学新知识和革命思想。当时有苏、浙、赣三省自费生钮瑗等人申请进入成城学校习军事，清廷公使蔡钧却拒绝保送。吴稚晖与孙揆均带着26个学生赴使馆与蔡均争论，相持达一星期之久。蔡钧恼羞成怒，指使日本警察以“妨害治安”罪名，驱逐吴、孙二人出境。吴稚晖气愤异常，写下绝命书，愤然投水自杀，幸被警察所救，被迫登上法国邮轮回国，在日本的蔡元培闻讯赶到船上护送他回国。这次经历使吴稚晖彻底认清了清政府的面目，由此萌发了革命的思想。

### 张园演说倡革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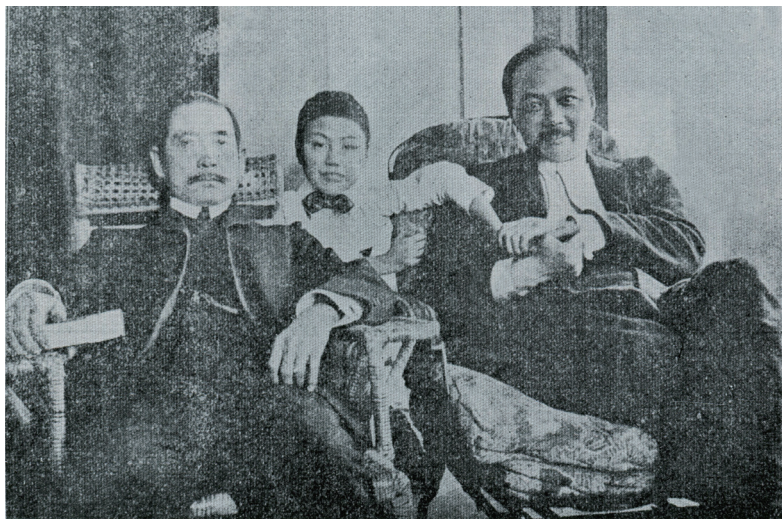
1902年4月，蔡元培、蒋智由、黄宗仰等人在上海发起成立了中国教育会。11月，上海南洋公学发生退学事件，退学学生求助于中国教育会。为帮助退学学生，吴稚晖、蔡元培等人发起成立爱国学社，蔡元培任总理，吴稚晖任学监兼国文教员。1903年起，吴稚晖又与蔡元培、陈范、黄宗仰等爱国学社成员在张园发起演说

会，每月演说一次，每周定时集会议论时政，演说的内容都是爱国、排满、革命等等，“校内师生高谈革命，放言无忌”。这时吴稚晖也就公然登上张家花园安垵第的演说台倡言革命。《苏报》将张园演说词刊登了出来。1903年夏，《苏报》聘章士钊为主笔，章太炎、蔡元培为撰稿人，报道各地学生的爱国运动，推荐、发表了邹容的《革命军》和章太炎的《客帝篇》、《驳康有为政见书》、《革命军序》等文章，旗帜鲜明地掀起一股宣传革命思想的高潮。清政府对此十分恐惧，派人勾结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捉拿邹容、章太炎、蔡元培、吴稚晖等人。结果，章太炎在租界被捕，邹容自动投案，吴稚晖在好友陆尔奎的劝说下离开上海，坐船到香港后转赴英国。

### 中山挚友助民国

吴稚晖于1903年9月4日抵英国伦敦。在英国他积极为中国留学生排忧解难，声望很高。1905年春，孙中山赴欧洲，他从留学生中获悉吴稚晖寓址，即亲自登门拜访。两人相见恨晚，显得格外亲切，此为中山先生与吴稚晖订交之始。

在伦敦，孙中山邀请吴稚晖一起到老师康德黎博士家里吃饭，得到了康氏热情相待。这次会晤给吴稚晖留



吴稚晖（右）旅英时与孙中山先生（左）合影

下深刻印象。3月的一天，孙、吴一同参观英国议院，当晚两人又长谈到深夜。后吴稚晖回忆道：“国父是一个很诚恳、平易近情的绅士。然而只觉是伟大，是不能形容的伟大，称为自然伟大，最为适当。世俗所谓伟大，都是有条件衬托出来的，或者是有贵人气，又或者有道学气，又或者有英雄气，或者摆出名士气，而国父品格的伟大，纯出于自然。”是年冬，吴稚晖抱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决心在伦敦加入同盟会。后与张静江、李石曾在巴黎组织世界社，发行《新世纪》，鼓吹革命。《新世纪》成为革命党的一大喉舌，与在东京出版的《民报》东西相应。当章炳麟、陶成章攻击孙中山借革命骗财物时，吴稚晖于《新世纪》撰文主持公

道，将事实昭告于世，使各地华侨了解真相，巩固了孙中山的领导地位及声誉。

在伦敦时，孙中山与吴稚晖曾商议用“青天白日旗”作为国旗，并亲绘此旗一面。因此，武昌起义成功的消息一传到英伦，吴稚晖立即制作了“青天白日旗”50面，悬挂于伦敦唐人街。吴稚晖当是悬挂“青天白日旗”的第一人，体现了他对孙中山建国理想的支持。

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吴稚晖到总统府与孙中山联床四日，每日晚间讨论政务，视为知己莫逆之交。当时孙中山希望他出任教育总长，吴稚晖志在做事，深以做官为畏途，力辞不就，后由其好友蔡元培任教育总长。1925年，孙中山在北上途中因肝病入院，委派吴稚晖、李石曾、汪精卫、陈友仁、李大钊五人为政治会议委员，在其病危时由吴稚晖主持起草总理遗嘱。初稿经五委员共同修改后决定，签署遗嘱时吴稚晖等皆在孙中山身边署名证明。孙中山逝世后，吴稚晖与孔祥熙总理丧事。

### 文化革新获殊荣

吴稚晖走遍中国南北，深知汉语同文不同音，各地方言常令外地人无法听懂，而其文则因无注音，让

人难以学习。他认为，“无音可读”是汉字的一大缺点，如果能为汉字“娶一注音老婆”，把所注国音并入汉文内，在全国推广，不仅可弥补汉字的缺陷，且可便利广大人民群众。吴稚晖早年就曾创拼音字母“豆芽字母”，教给其不识字的妻子拼写家乡方言作为通信工具。1912年5月，蔡元培赴北京出任民国政府教育总长，邀吴稚晖主持国语注音字母工作，致力推进全国读音统一。1913年1月，吴稚晖担任国语读音统一会会长，用3个月时间，主持制定注音字母，由教育部公布实施。1917年在此基础上取6000余字编定《国音字典》，出版进入全国各地小学校，奠定了民国时期推行“语同音”的基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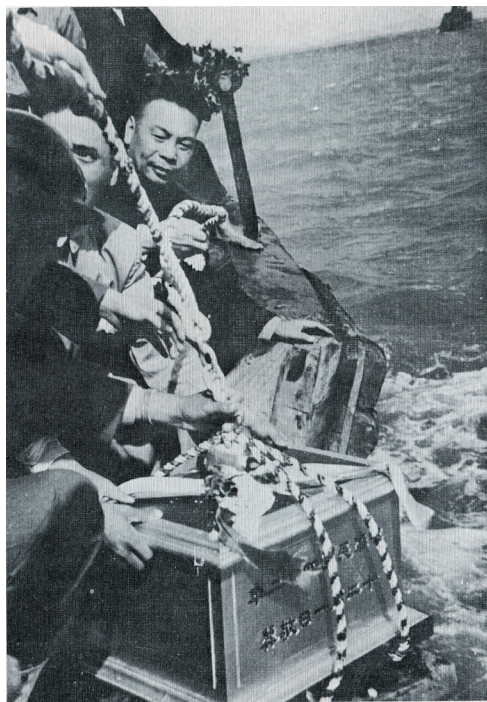


吴稚晖（右）与蔡元培合影



吴稚晖致力国音统一，有利于提高全国平民的识字能力和文化水平，在中国现代史上有重要的意义。1928年6月，中央研究院于南京成立，这是国家最高学术机构。1935年，中央研究院成立第一届评议会。1948年9月1日，中央评议会第二届第五次年会选举产生第一届院士共81名。吴稚晖及常州学者赵元任、华罗庚、张景钺、吴定良等当选首届院士。1930年5月，国际联盟会聘请吴稚晖为国际文化事业协进委员会委员，此为吴稚晖首次获得的国际文化学术荣誉。

1953年，吴稚晖因病逝世，享年89岁。蒋介石题词“痛失师表”。遵吴稚晖遗嘱，其骨灰洒在金门大海中，以示思念大陆，不忘祖国统一之情。在金门县金城镇水头附近，还有一座吴稚晖公园，园内有一于右任题字的稚晖亭，亭中央是蒋介石



蒋经国（右一）亲自把吴稚晖骨灰水葬于金门外海

石亲书的碑文“吴稚晖先生水葬纪念亭”，公园尽头则是吴稚晖半身铜像。1963年，吴稚晖百年诞辰之际，为纪念他在文化学术及科学方面的贡献，联合国文教组织将吴稚晖列为世界百年文化学术伟人。



## 江苏代理都督庄蕴宽

庄蕴宽（1867—1932），字思缄，号抱宏，江苏常州人。清末科举入仕，历任晚清百色厅同知、平南知县、梧州知府、太平思顺兵备道兼龙州边防督办等职。服官广西期间，积极开办新学、编练新军、引进新式人才，以武



庄蕴宽

功肇建广西，被誉为培养边疆文武人才的“祖爷师”。愤于清廷腐败祸国，辛亥前夕庄蕴宽辞职回乡。武昌起义爆发后，他为东南地区光复及江苏新政权建设奔走，民国初被推任代理江苏都督。北洋政府期间，他历任都肃政史、审计院院长等职，当选约法会议议员，因反对袁世凯复辟而名满士林，还是故宫博物院创建人之一。

### 向往维新荫庇革命

庄蕴宽出身书香世家，幼年丧父，以苦学入仕，1890年中副贡，1896年赴广西任职。庄蕴宽主政期间，

以清廉刚直、爱民惜民自守，勤政为民，造福边区。

正是在广西一隅，庄蕴宽深切感受到列强环伺、国弱民贫的处境，对清政府有所不满，加之与维新志士有所接触，对社会改良深表认同。1894年，庄蕴宽随广西浔州知府夏敬颐赴京为慈禧太后贺寿，结识了倾向光绪新政的文廷式，交往甚密；1897年，庄氏在桂林恰逢前来讲学的康有为，直接接触到维新思想的精髓；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六君子噩耗传来，时任百色厅同知的庄蕴宽倍感压抑。

随即，庄蕴宽又开始接触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重要骨干，并不顾政府官员的身份冒险襄助革命派领袖。1902年冬，庄蕴宽在河内博览会上偶遇《中国日报》主笔陈少白，二人谈及民族危亡问题，一致认为非革命不能救中国。庄蕴宽还流露出相机反正、复归正道的意图。1906年，黄兴谋划在广西发动革命，化名潜入龙州求见庄蕴宽，受到庄之亲信岳宏群的秘密接待。庄氏冷静权衡局势，认为时机尚早，仅一地起义难成大事，徒然糜烂地方，应待机而谋。庄蕴宽对形势的精辟分析说服了黄兴放弃原定计划。庄氏又资金二百作为路费，派兵秘密护送其出镇南关。1907年黄兴亲自主持镇南关之役，冒险出入越桂间，不慎为法国警察截留，庄蕴宽又联络

法国教堂司铎，设法成功营救黄兴。缘此，庄、黄成为生死密友。

庄蕴宽虽未发动革命，但对革命者宽容相待。他借清末新政编练新军之机，邀请同盟会会员、南菁书院同学钮永建主持广西边防教导团和讲武堂，邀请“边地先觉”曾汝璟担任边防法政学堂监督，邀请蔡锷做陆军测量学堂总办，邀请汤尔和驻龙州襄理一切。又赶赴日本考察军政之际，吸收大量革命倾向明显的留日士官生来广西效力，其中包括李书城、王孝缜、孙孟戟等。这批新式人才在庄蕴宽的荫庇之下，宣传革命思想，培养革命力量，播撒革命种子。可以说，广西革命力量的聚合“一是经李经羲、郭人漳的关系，一是庄蕴



庄蕴宽创建的广西边防将弁学堂师生合影

宽、钮永建的关系”。

### 出谋划策奔走前线

1910年初，庄蕴宽因出任吴淞商船学校监督而卜居上海，因地缘之便，与同乡立宪派人物赵凤昌时常往来，并于同年加入张謇等人筹办的预备立宪公会。此后，他便与赵凤昌、张謇、汤寿潜等人往来甚密，并利用个人丰富阅历和深厚人脉为东南地区光复及江苏新政权建设奔走出力，其政治主张也渐与立宪派趋于一致。

1911年秋，武昌首义，全国震动，江浙士绅中同情革命者奋袂而起。此时庄蕴宽移居赵氏在沪的居所“惜阴堂”，邀其旧部钮永建、王孝缜、赵正平等来谈，不久，黄兴、汪精卫、章炳麟、宋教仁、章士钊、于右任先后到来，缜密筹划革命。

面对骤变的革命形势，上海同盟会也准备举事响应。革命党人陈其美等带领敢死队夜攻江南制造总局，因战斗失利，反被清军扣为人质。庄蕴宽闻讯，迅速向上海民族资产阶级上层代表人物李平书建议，立即率商团众速攻制造局，先救人质，进而光复上海。会党同仁采纳了这一建议，于9月13日21时开始合力攻打制造总局。张士珩闻风先遁，革命军顺利攻入制造局，救出陈、高二人，并一鼓作气，乘夜进军，至拂晓光复上海



江南制造局

全城。在上海起义前夜，庄蕴宽极力促成李平书等绅商参与革命，果断决策，在上海光复中功不可没。

上海光复未几，江浙也先后宣告独立，而南京尚在铁良、张勋的控制之下，汉阳又面临北洋军全力反扑。局势瞬息万变，此时急需筹划建立统一的领导机构来整合各方力量，推动形势向积极的方向发展。鉴于私交渊源，沪上名流推举庄蕴宽代表江浙方面前往武汉与黄兴沟通。

11月23日，庄蕴宽持张謇、章太炎的信启程赴鄂。他先抵武昌面见黎元洪，后由专轮护送过江与黄兴见面。当时黄兴正在汉阳襄河指挥作战，闻讯赶到昭忠祠革命军总部。身着短装、头扎白巾、风尘满面的黄兴，见到庄蕴宽则“握手相告劳，喜极出涕，出粗粝共食”。二人边吃边探讨时局，黄兴认为革命军如能及时攻克南京，可以稳定东南半壁江山，纾解武汉之困，全盘扭转革命形势。然后庄蕴宽又将所带信件交给黄兴，信中说全国十八行省已有十一省响应革命，大事已定，

建议以和谈结束革命。黄兴表示筹建全国军政机构确是当务之急，他决定自己留在武汉指挥作战，改派宋教仁前往上海，联络张謇，支持筹备江浙联军。

庄蕴宽星夜兼程，将黄兴的意见带回上海，敦促苏军、浙军、镇军及沪军合力会攻南京。11月27日汉阳弃守，而12月2日南京光复。南京是江南的政治中心，其归属必会影响到沪、苏、浙等地革命政权的存亡，且南京光复也为不久后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庄蕴宽不避艰险，沟通东西两条战线，有功于南京光复及东南局势之稳定。

### 主政江苏稳定一方

由于在辛亥革命中的过人表现和突出贡献，庄蕴宽在江浙士绅名流中深孚众望。综合德望、才能、立场等因素考虑，原江苏都督程德全以及张謇、汤寿潜诸人皆推举他为江苏都督。1912年1月10日，民国临时政府任命庄蕴宽为江苏代理都督。

庄蕴宽主持苏政近四个月期间，颁布政令数十道，



代理江苏都督时的庄蕴宽



在严禁赌博、通告剪辫、鼓励农业生产、发展民族工业、普及教育和革除社会陋习等方面做了大量除旧布新的工作，努力为新政权树立形象。一是稳定秩序。民国初肇，民心不稳，社会纷乱。庄蕴宽上任伊始即主理民政，严肃处理了“缪思敬案”（缪思敬时任临时大总统府庶务科长）和“赵不党案”（赵不党时任常州军政分府司令）。通过明典刑、平冤狱安定民心，切实贯彻“不扰民”政策。二是发展经济。民国伊始，民生艰难，财政短绌。庄蕴宽以开源节流之法维持政府的日常运转：他一面裁军，减少军费支出；一面开辟多种渠道，增加政府收入。面对捉襟见肘的财政窘境，左右曾建议庄蕴宽通过发行军用券度过难关。他认为缺乏基金、物资担保的军用券日后必成废纸，如此行径实际是将困难转嫁于百姓。庄蕴宽“不忍糜烂地方，使百姓遭受苦难”，表示“宁去而不为也”。任期内江苏全省未曾滥发纸币一文，坚守“不借债”一戒。三是整顿军务。辛亥未久，战事未竟，时有散兵游勇窜扰地方，成为民初一大问题。庄蕴宽首应黄兴通电，裁撤军政府，缩减军队，并移节苏州，成功处置原革命军四十六标陆军部分士兵引发之“阊门兵变”。民国伊始，江苏一省之内系统分立，苏州、上海、镇江设军政府，扬州、常

州又有分府。庄蕴宽继任后立即将军事、外交权交归中央，坚持服从中央领导，立“不增兵”一律，严戒拥兵自治。

自1910年加入预备立宪公会至1912年5月辞去代理江苏都督一职，庄蕴宽与赵凤昌、张謇、汤寿潜等人通力合作，对建立并稳固东南地区新政权作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

### 维护共和反对复辟

1912年2月12日，宣统帝正式下诏退位。翌日，孙中山向南京参议院请辞临时大总统职务，让位于袁世凯。在建都问题上，以袁世凯为首的军阀官僚集团与立宪派、革命派无法达成共识，引发了一场定都之争。在这场政争中，庄蕴宽与其他立宪派人物一样，担心旧势力复辟和外敌入侵，把统一国家的希望寄托于袁世凯。他两次致电孙中山，并通电各省都督、督抚、省议会、咨议局，呼吁地方实力派支持定都北京。庄蕴宽之所以支持迁都北京，一方面是出于个人对当时政治局势的判断，另一方面也是服从张謇等立宪党人的观点。

袁世凯如愿执掌政权后，采取一系列措施向复辟帝制迈进，影响特别巨大的是1913年3月在上海刺杀宋教仁。此时，庄蕴宽逐渐从统一强国梦中警醒，摆脱了对

袁氏的迷信，加入到反袁阵营，自觉维护起硕果仅存的共和体制。1914年3月约法会议召开，会议旨在炮制新约法以取代临时约法，将袁世凯越权之举合法化。庄蕴宽作为圈定议员之一，坚持临时约法的精神，反对总统独揽大权，主张继续实行内阁制，成为会议中真正的少数派，表决结果为43比1，唯一的反对票就来自庄蕴宽。

帮助袁世凯复辟帝制的筹安会成立后，庄蕴宽所领导的肃政厅公署收到来自各处弹劾杨度及筹安会的呈文。呈文者钦佩庄蕴宽不畏强权的品德，将自己的意见交由他上传。都肃政史庄蕴宽不负所托，齐集肃政史召开特别会议，讨论筹安会问题，议决呈请袁世凯取消筹安会。这样的一纸呈文令庄蕴宽成为复辟党的眼中钉，甚至有生命之虞。但庄蕴宽置死生于度外，笑语：“我每日坐马车上上班，如有狙击者，可由车后开枪，距离我头颅较近，易于射中目标，而且不致伤及无辜车夫。”

1915年12月，1993名所谓“国民代表”投票决定国体，结果全部拥护君主制，并设立登极大典筹备处，宣布次年改元洪宪。庄蕴宽坚守都肃政使之职责，仍以公函形式呈文袁世凯，痛陈“帝制不可为，民意不可假，时代潮流不可拂”，并提出取消洪宪年号、撤销大典筹

备处及参议院。面对庄蕴宽这种公然蔑视帝制的做法，袁以20万元支票收买他，而庄氏撕毁支票以明志。

此时流亡美国的黄兴重病在身，情急无奈之下，在一张当地报纸的背后，给庄蕴宽及张謇、汤寿潜、唐绍仪、赵凤昌、伍廷芳六人写信，要庄蕴宽等人保卫民国。如此托付危局，尤显倚重，庄蕴宽体察故友困境，读信而泣。

面对北京汹汹复辟之势，庄蕴宽最后向北洋政府请辞，与钮永建等辗转从广西来上海，联络同志旧识，谋求江苏方面响应反袁斗争。

庄蕴宽是近代中国转型时期一位特殊的历史人物，其一生经历了晚清政府、南京临时政府、北洋政府以及南京国民政府四个历史时段，尤其在辛亥革命前后作出了独特的贡献。他的思想不断随着时代需要与社会发展而演进，呈现出从一个封建旧官僚转而同情维新变法再到襄助辛亥革命、维护共和制度的转变轨迹。而促成这一转变的根本原因在于其具有爱国爱民的思想内核。庄蕴宽一生都在为争取一个以民为本、前途光明的政府而努力。

## 江西首任都督吴介璋

吴介璋，字德裕，号复初，1875年生于常州。他从小聪明好学，十七八岁时受聘在当地黄村私塾执教，同时发愤攻读，期望在科举场上搏得功名，为国奉献自己的聪明才智。

甲午战争战败，吴介璋再也按捺不住满腔怒火，他不顾父亲的反

对，毅然弃文从戎，考入南京江南陆师学堂，成为常州接受西方军事教育和训练的第一人。他学习、训练非常刻苦，颇得要旨，每次竞技比赛中均有出色表现，赢得了教官的赞赏。1898年毕业时，他是少数几个留校当助教的优秀学生。

吴介璋的优秀之处是文武贯通。1899年，陕西巡抚魏光焘到江南陆师学堂物色训练新军的人才，他被选中并出任武威新军统带（相当于团长），为陕甘地区的军队带去了一股新风。



吴介璋

## 训练江苏新军

1902年，清政府倡办“新政”，在中央设立练兵处，各省成立督练公所，编练新军、裁汰旧营。吴介璋应江苏巡抚之邀，从陕西回



辛亥革命后督军署（原清代督练公所）

江苏，任督练公所提调，协助总办负责新军训练事务。

吴介璋认为，训练新军的目的是为了提升战斗力，原旧营中的兵士及下级军官文化素质较低，陋习难以根除，提高战斗力不能依靠他们，必须有计划地征招新兵进行集训，陆续替换淘汰旧军。巡抚、总办采纳了他的建议，委他全权负责。

吴介璋把训练新军的目光瞄准那些有志青年，仿效德国的做法，改过去“招募”制为“征募”制。制定征兵的新条件为：一是自愿报名，体现个人的志趣；二是限制年龄，必须是青年；三是接受过一定的文化教育；四是身体强壮，不能有残障。

吴介璋是常州人，所以他把“征募”的重点放在了常州府。常州城里专设了征兵处，在府属八县征募有志

青年入伍。为改变过去老百姓“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的传统观念，他亲赴无锡、金匱、宜兴、荆溪、江阴等县演讲，用“国不强，焉能安”的道理激励青年为抵御外强奉献自己的青春和热血。八县的青壮年受他感召纷纷响应，报名者多达千余人。经严格筛选，有数百名合格青年注册入伍接受西式正规军事训练。在他的严厉督教操练下，他们成了江苏新军的骨干力量，后来在江浙沪联军攻打南京天堡城的战斗中冲锋陷阵，为江苏独立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 培养新军英才

1903年，魏光焘调任两江总督（管辖江苏、江西、安徽三省防务），他赏识吴介璋训练武威军和江苏新军的才能，将他调到江西，担任江西武备学堂总教练和江西陆军小学堂、江西陆军测绘学堂总办（校长），集训练、教学、选材于一身。三年中，他任上走出了三期毕业生，这些学生思想活跃，向往民主，后来都成了江西新军中的骨干，至辛亥革命前，他们在步兵、马、炮、辎各营队中担任主官，成为推动江西独立的重要革命力量。

吴介璋在江西培养训练的一大批新军人才中，李烈钧、欧阳武、胡谦和余鹤松影响最大。他们学习用功，

训练刻苦。1904年中央练兵处下拨给江西四个公费留学名额，吴介璋把机会给了他们。他们进入日本著名的军事学校——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不仅学到了先进军事专业知识，还受到东京同盟会革命思想的洗礼。

留学生学成回国时，吴介璋担任江西陆军第二十七混成协协统（旅长），他把留日学子看作振兴江西兵事的新鲜血液，安排李烈钧任五十四标第一营管带（营长）；胡谦任五十四标第二营管带；余鹤松任五十四标教练员；欧阳武任混成协参谋官，后改任五十四标炮兵营管带。

江西巡抚对李烈钧等在新军中大肆灌输宣传革命思想极为不满，下令抓捕李烈钧，准备军法处置。多亏吴介璋及时站出来为他说情开脱，李烈钧才得以远走云南。吴介璋“格外关照”的这些青年军官，后来在辛亥革命中都成了风云人物。李烈钧先后任九江军政分府总参谋长、江西第三任都督等职，在“二次革命”中，他第一个竖起了讨伐袁世凯的大旗，后晋升为民国陆军上将。欧阳武先后担任江西独立后的陆军总司令、江西护卫军司令官、江西陆军第二旅旅长。“二次革命”中，列名讨伐袁世凯，任江西都督，解放后任江西省副省长、省政协副主席和全国人大代表等职。武昌起义后，



胡谦在袁州、萍乡立马响应，率营革命，脱离清政府，宣布独立，任袁（州）临（川）瑞（金）都督府都督，江西统一后，改任萍乡分府都督，后为江西都督府高级参谋，在“二次革命”中，任讨袁军总参谋长，后追随孙中山在广东创办黄埔军校，是第一任教育长；余鹤松以教练官身份，率领五十四标部分新军起义，任独立后的江西第二旅旅长，“二次革命”中，随李烈钧讨伐袁世凯。

### 主导江西起义

吴介璋1906年升任江西督练公所总办，肩负江西编练新军的全权之责，成为江西巡抚之下掌握军权的第二号人物。次年清政府将全国各省的新军统一编号，驻扎江西的清军编为暂编第二十七混成协，由吴介璋任协统（旅长），下辖步兵五十三、五十四标（团），还有马、炮、辎各营。五十三标驻扎九江，五十四标驻扎南昌。江西巡抚冯汝骥看到五十四标下面的营级军官革命思想浓烈，又都是吴介璋的亲信，为削弱吴介璋的权力，他将五十四标调离南昌驻袁州，将巡防营改编为第五十五标驻守南昌。

武昌起义后，驻九江的五十三标，经革命党林森、蒋群等鼓动，首先于10月23日响应，宣布脱离清政府独

立，成立九江军政分府，推五十三标标统马毓宝任都督（26日由回九江的李烈钧接任）。巡抚冯汝骥大为恐慌，急调五十五标部分营队赶赴九江压制，不料半路上部队逃散。

这时南昌发生连锁反应。10月25日，《江西民报》刊登九江独立捷报，新军协统吴介璋联络革命军，决定在30日晚上起义。巡抚冯汝骥闻讯急调上饶巡防营刘懋政部日夜兼程赶到南昌，严密监视南昌城内外的新军，收缴陆军小学堂的枪械，并派兵备道总办张季煜将吴介璋软禁在巡抚衙门内，不准他外出活动。

新军队伍中的革命热情已经蓬勃高涨，无论冯汝骥怎样许诺、诱惑、恐吓，已动摇不了革命军人推翻清政府的决心。他们按照原先确定的起义计划，由驻扎城外的第五十五标马营管带方先亮、工程队官蔡杰、辎重队官宋炳炎等与城内陆军小学堂、测绘学堂的学生里应外合，在31日驱逐了守城士兵，打开城门，冲入城内，迅速占领了各个衙门，将遭软禁的吴介璋解救出来。

11月1日，江西军、民、商、学各界代表聚集万寿宫开会，通电全国宣布江西独立，吴介璋因拥护革命、办事开明，在江西军界资望极高而被推选为江西独立后的首任都督。

## 追隨中山謀北伐

1916年，吳介璋被北洋政府任命為蒙古多倫勛使前往蒙古考察邊防。事畢撰有《蒙古邊防計劃書》，他建議國家集中人力財力開墾蒙古，拓展邊防建設，收復被沙俄侵吞的外蒙失地。可當時的北洋政府根本無意顧及“蒙邊計劃”，只管打內戰搶地盤，吳介璋非常失望。

1917年，馮國璋、段祺瑞控制政府，拒絕恢復《臨時約法》和召開國會，妄想以武力建立獨裁統治。吳介璋追隨孫中山南下護法，在廣州成立的中華民國軍政府中任軍事參贊。不久被大元帥府參謀總長李烈鈞聘為參謀部總參議。1922年6月，陸軍部長陳炯明在廣州叛變，圍攻總統府，他參與“討陳戰役”。後孫中山失敗，他又隨其輾轉上海。

1923年1月1日，孫中山在中共和蘇聯的幫助下，重新改組國民黨黨部，成立13人軍事委員會，吳介璋與柏文蔚、蔣介石等一起被任命為委員，並晉升為陸軍中將，為籌備國民革命軍北伐出謀劃策。1926年北伐開始，吳介璋出任國民革命軍兵站部總監，負責全軍後勤保障，身歷多次戰役。當北伐軍與五省聯軍總司令孫傳芳部對峙九江時，他又被派往上海，秘密聯絡反對軍閥統治的社會力量，大造反孫輿論，動搖孫傳芳在後方的

阵脚，为北伐军歼灭孙传芳部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令人惋惜的是，他于当年因车祸身亡，没有看到北伐成功。有人说是被暗杀，但真相如何已成为历史之谜。后来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追赠他为陆军上将。

在辛亥革命中，江西是响应武昌起义、宣布独立较早的一个省，这是与江西督练公所总办吴介璋密不可分的。吴介璋在练兵过程中非常乐于提携那些有思想、有抱负的激进青年，使新军队伍中的革命倾向逐渐漫延，形成了气候，为江西较早响应武昌起义、独立埋下了伏笔。江西的独立又促进了浙江、江苏、福建、安徽独立的连锁反应。



出土时的吴介璋墓碑

## 湖北新军教头吴殿英

1911年10月10日傍晚武昌起义爆发，由此敲响了清王朝的丧钟。说到武昌首义不能不论及湖北新军，而说到湖北新军不可不论及协助张之洞创办湖北新军的吴殿英。

吴殿英，字佑孙，1842年生于常州，光绪年间举人。自1888年起在浙江平湖任县令，人称“平湖公”，有“亲民、厚民、办学、育人”的口碑，甚孚众望。1895年，吴殿英卸任，由常州同乡、张之洞首席幕僚赵凤昌引荐，拜谒了署理两江总督的张之洞。张之洞知悉吴殿英在平湖的良好官声，赏识他拟办南瀛书院的计划，相互间又有“练兵求强”的共识，因而诚邀吴殿英留幕府备用。



吴殿英

### 组训精锐之师

中日甲午战争结束后，清廷朝野兴起“整军经武”、“改革军制”的呼声。1895年，恭亲王、庆亲王等采纳德国军官冯·汉纳根的建议，在天津组建定武

军，后袁世凯接任，更名为新建陆军。同年，署理两江总督的张之洞在南京组建自强军，德国军官负责训练。1896年，张之洞返湖广总督本任，临行前从自强军挑500人，组建湖北护军，即湖北新军前身。1901年清廷废除武科举，同意各省开设武备学堂，培训新军军官。一时间，湖北与直隶成为各省新军建设的榜样。河南、山东、山西选送军官赴直隶受训，江苏、安徽、江西、湖南选送军官赴湖北受训。因此，湖北的新军建设及其军事教育，其影响远逾一省，实达全国。

1896年，张之洞委任文官出身的吴殿英为都司衔监操官，担负组训新军的要任。吴则不负重望，在组建湖北护军，进而组建湖北新军方面献谋尽力，创榛辟莽，卓有建树。

1898年，张之洞委派首批五人赴日本考察军事，有直隶州知州姚锡光，游击张彪，都司衔守备吴殿英，五品顶戴千总黎元洪，东文翻译生瞿世英。在这五位中，姚锡光从日本考察归国后即调安徽任职，张彪、黎元洪返鄂后任湖北新军军官，瞿世英是翻译，他们回国后都没涉及湖北新军及湖北武备学堂建设的组织领导工作。吴殿英文官出身，有较高学术素养，有办学资历，是此次“游历详考”日本军制及各种学堂章程的重要整理



吴殿英（二排中）、吴稚英（一排左一）父子1898年在湖北武备学堂

者。部队的编制及组训方法，武备学堂及其他军事学堂的办学规则、课程设置、授课之法，吴殿英“或随时笔记，或购取章程”，一切都“务详勿略”。

回国后，吴殿英制订了湖北新军的组建规程、训练方法，湖北军事教育的高等（武备学堂、将弁学堂）、中等（武普通中学堂）、初等（陆军小学堂）三级教育体制。他还主持撰写了《湖北新军练兵要义》，其主要内容有：一，入营之士兵必须有一半识字；二，人人皆习体操；三，各营人人操炮；四，马队不设马夫；五，营房力求整洁，宜于卫生；六，器械资装随身具备；

七，待兵以礼；八，统带、营哨官皆亲身教练，不准用教习；九，将领、营官、哨官不许穿长衣；十，阅操之时，各官皆不许坐看。

在吴殿英等人精心操练下，湖北新军成为清末一南一北、一中央一地方最精锐的两支新式军队之一。1906年，南北两军在河南彰德举行大会操。北军是直隶总督袁世凯编练的第三镇，南军则是张之洞训练的第八镇。南军行前，张之洞在吴殿英陪同下到演兵场检阅壮行，各国驻汉口领事也应邀参观。湖北新军身躯强壮，军容整齐，枪械精良，马步、枪、炮各兵种技艺娴熟，攻防战术运用得当。不仅令中国官员耳目一新，也使外国领事惊叹。这次南北会操的结果是湖北新军与北洋新军平分秋色，湖北新军由此声名大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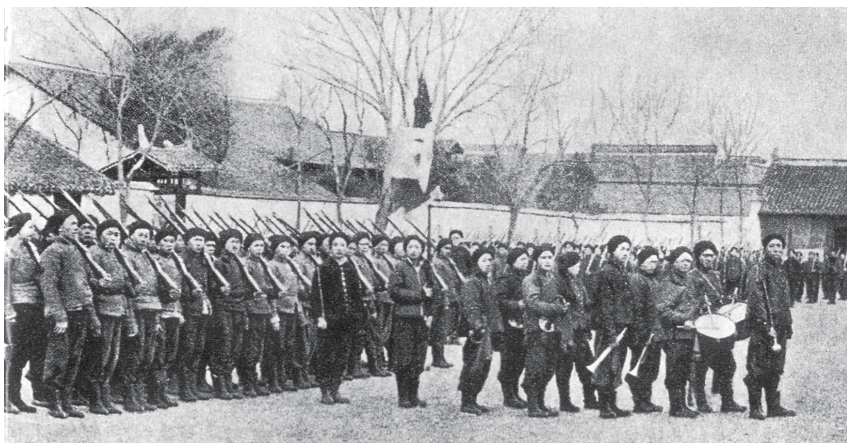
### 容留革命志士

吴殿英组训的湖北新军从装备、征募、训练到管理，都有别于旧式军队。较之中国旧式武装（如清代的八旗、绿营及练勇），新军之“新”主要表现在：第一，废止戈矛土銃，代之以新式后膛枪、克虏伯大炮；第二，编制、训练仿效德、日；第三，淘汰老弱和兵痞，募兵对象为士农工商的“安分子弟”；第四，指挥官由军事学堂出身者担任；第五，对入伍者的年龄、体



格、文化程度都有规定，尤其是要“能识字、写字，并略通文理”，保证了新军官兵的较高文化水平。湖北新军组建之际，适逢“废科举”，大批读书人断了“学而优则仕”的出路，转而投笔从戎。大批青年学子入伍，更便于部队掌握新式武器、接受近代化军事训练，也为革命党的宣传及组织活动提供了思想文化基础。

同为新军，湖北新军与北洋六镇相比还有自己的特点：北洋六镇是清廷的中央军，统帅袁世凯及手下将领段祺瑞、冯国璋等是军阀型人物，对军中一切“异端”活动严加打击，因而北洋军极少有革命党人的活动空间，故北洋军在清末民初一直是一支反动武装。湖北新军受清廷控制相对松弛，张之洞等湖北当权人物虽然也防范革命者潜入新军，但对革命党人的活动大多



操练中的湖北新军

采取“大事化小，小事化无”的态度。新军中发现党人活动，往往作调离处理了事。加之张之洞有“惜才”之好，对于某些有革命倾向的干才暗加保护，如当有人告发吴禄贞为革命党，张之洞只将吴调离湖北，而且推荐到朝廷，赴北京练兵处任要职。吴殿英也是思想开明，支持革命党，爱才用才，对新军中下级官佐爱护有加。

大批青年知识分子及纯朴农民聚集一堂，又有着相对宽松的环境，湖北新军在清末十年间成为革命党人开展宣传与组织活动的良好舞台。至武昌首义前夕，湖北新军一镇一混成协共15000人，直接加入共进会与文学社等革命组织的已达2000多人，受其影响的有4000多人，站在清廷一边的不足千人，其余一半人处在中间状态。辛亥武昌首义由这样一支新式正规军队而发动也就决非偶然了。

张之洞1907年调北京任大学士、军机大臣，先由陈夔龙继任湖广总督，后由瑞澂接任。瑞澂就职后询问湖北新军第八镇统制张彪：“老实说，你部队中究竟有多少革命党？”张彪答曰：“不敢瞒大帅，大约有三分之一。”这一估量大体不错。

1907年，端方由湖北巡抚调任直隶总督，入京晋见时，慈禧对端方说：“造就人才的是湖北，我所虑的也

在湖北。”政治嗅觉敏锐的慈禧洞见到湖北新军中蕴蓄着主事者主观愿望之外的历史能量。这种能量在1911年10月，即慈禧身后三年、张之洞身后两年便得到了充分展现。

武昌起义爆发不久，欧阳萼在给袁世凯的信中对张之洞大加挞伐：“追原祸始，张文襄优容新进，骄纵军人，养痍十余年，糜帑数千万，兴学练兵，设厂制造，徒资逆用，以演成今日非常之惨剧，殊堪浩叹。”与此恰成反照，孙中山1912年4月访问首义之区武昌，详考张之洞在此兴实业、办教育、练新军，为首义爆发奠定基础，深有感慨地说：“张文襄乃不言革命之大革命家。”无论是革命家的盛赞，还是保皇派的挽歌，都从不同的侧面肯定了张之洞率领吴殿英们创建湖北新军的巨大历史功绩。

吴殿英为创办和训练新军，事无巨细亲力亲为，心力交瘁，更因诸多事情有违朝廷意旨而饱受排挤打压。加上张之洞后来调到北京任军机大臣，实际上被剥夺了权力，新军中的革命党也受到整肃，吴殿英逐渐失势，心境更加恶劣，肝郁不舒，还患上肠胃病，久治不愈，于1907年去世。

## 《苏报》馆主陈范

1901年至1904年是中国民主革命思想传播的重要阶段。这一时期，革命派在国内建立的第一个舆论阵地就是《苏报》。当时，《苏报》连续发表《读〈革命军〉》等一系列文章，大骂皇帝和清政府，高呼革命为神圣“宝物”，要求建立资产阶级“中华共和国”，推荐《革命军》为国民必读的第一教科书。同时报道各地学生的爱国运动。为此清政府照会上海租界当局，以“劝动天下造反”、“大逆不道”罪名将章太炎等逮捕。邹容激于义愤，自动投案。《苏报》案是民主革命走向高潮过程中的一起著名反清政治案件。就是因为这件事，国际上才知道中国有反对清政府的革命派，可见其影响之深远。这个《苏报》馆主就是常州人陈范。

### 接办《苏报》宣传革命

陈范，1860年出生在常州一个有着浓郁文化气息的书香家庭。像那个时代绝大多数的读书人一样，陈范接受了几年正规的封建教育后参加了科举考试，希望能够取得功名，但结果却是“累试不第”。后通过捐买就任江西铅山知县，在任上，陈范逐次整顿、革除弊端，遭到地方恶势力的阻挠和反对，也为上司所不满，被弹劾革职。



陈范（中）与家人合影

1898年，陈范来到上海。一日从朋友处得知《苏报》欲出售。这是一家创刊于1896年的日商报纸，这一时期的《苏报》内容是十分陈腐的，所载大多是市井琐事甚至黄色新闻、谄媚权贵之事。不多久，报纸就因销售不畅、亏损严重而难以为继。陈范考虑到自己对文字工作的兴趣，就从经营不善的胡璋手中买下了《苏报》。



1903年7月7日《苏报》封刊号

陈范接管《苏报》后，摘去外商的牌子，将它变为中国人自己的报纸。陈范的妹夫汪文溥、儿子陈仲彝、女儿陈撷芬也赶来馆中帮忙。

当时，上海报界著名的报纸很多，竞争很激烈。《苏报》从易主开始就面临着稿源匮乏、销售不畅的困境，有随时倒闭的危险。

然而，陈范与革命党人的交往改变了《苏报》的命运。1900年夏，唐才常、林圭等人在上海组织正气会，陈范参加了这个组织。1901年春发生的拒俄密约事件和“张园”演说会，都能见到陈范的身影。1902年4月，蔡元培、蒋智由、黄宗仰等人在上海成立中国教育会，陈范是成员之一。1902年11月，中国教育会成立爱国学社，蔡元培任总理，陈范参加了开社典礼。

随着变化的时局，陈范不断地调整办报思路，从保皇而渐趋革命，《苏报》的舆论导向悄然转变。爱国学社的经费不足，就与《苏报》相约，由学社教员蔡元培、吴稚晖、章太炎等七人轮流每日为报社写一篇评论，报社则每月给学社一百银元作为报酬，由此《苏报》渐为爱国学社师生发表言论之园地。

### 《学界风潮》弘扬正义

上海南洋公学退学事件引起了陈范和《苏报》的关注。《苏报》率先报道此事，澄清事情真相，赞扬学生的正义举动，斥责校方和顽固教习的愚昧、蛮横。后来，南京陆师学堂也发生了退学事件，《苏报》也给予了报道，抨击学校当局干涉言论自由。当时，清廷实行“新政”，各地竞相兴办了许多新式学堂，推动了新式教育的普及和西方先进文化的传播，但也造成学堂内新旧思想交织、两种文化冲突引起的罢课、退学等事端频出，且有愈演愈烈之势，这也是辛亥革命准备时期民众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很多报刊生怕触动时忌，不敢报道或仅是轻描淡写地提及。《苏报》特立独行，热情报道各地学潮情况。1903年2月，《苏报》开辟“学界风潮”一栏，将各地学堂中的腐败黑暗现象公之于众，赞扬进步师生的抗争。这样，《苏报》大为世人瞩目，销

售量节节攀升。

1903年5月，陈范正式聘请爱国学社学生章士钊为《苏报》主笔，对《苏报》进行了大改革，使得形式更加活泼，内容更加充实、精练，论说的分量重了，战斗性更强了，几乎以一种全新的姿态屹立于报林之中。改革后的《苏报》主要宗旨是反对改良、宣传革命。6月7日，章士钊得到陈范默认后在《苏报》上发表《论中国当道者皆革命党》一文，矛头直指清朝大吏，后又连续发表了引人注目的邹容的《革命军》和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等的“新书介绍”，刊登《序〈革命军〉》、《读〈革命军〉》、札录《驳康书》等有影响的文章。

### 不畏强权勇往直前

《苏报》针砭时弊的激烈言论早已引起了当道者的注意和忌恨。1903年6月，两江总督魏光焘电告外务部称：“查有上海创立爱国会社，招集群不逞之徒，倡演革命者邪说，已饬查禁密拿。”清廷即时下旨：“著沿海沿江各省督抚，务将此等败类严密查拿，随时惩办。”于是，两江总督魏光焘派遣江苏候补道俞明震到上海，要他联络租界当局共同查办爱国学社和《苏报》。



俞明震思想比较开通，同情士类，他就是鲁迅在《朝花夕拾·琐记》中所说的那个“新党”。1903年6月25日，俞明震亲自到《苏报》馆找陈范，恰逢陈范外出。第二天，又召见了吴稚晖，对吴说：“《苏报》闹得太厉害了，梦坡是我熟人……先生等劝其温和些，太炎先生似乎闹得亦太凶。”吴稚晖说：“二人脾气，恪士先生所知，但朝政如此，亦难怪出言愤激。”俞明震听到这里，皱了皱眉，又对吴说：“话如此说，太厉害，也叫当道受不了。”并起身至窗前案上，抽出一公文给吴看，原来是两江总督魏光燾所发的命令：“照得逆犯蔡元培、吴敬恒，倡言革命，煽乱谋逆，着俞道会同上海道密拿，即行审实正法。”吴稚晖读至此，公文就被俞明震抽回，并笑着与吴稚晖一同吃面。

《苏报》接到这样的警告后，依然我行我素，倡言无忌。第二天，竟刊出文章《论江南陆师学堂指退学生为革命党事》，指名斥责俞明震。又连续发表了言词激烈的文章，抨击清廷，声称“革命之事不可一日缓”。29日，更是登峰造极，将章太炎驳康有为的长文摘录一段，冠以《康有为与觉罗君之关系》的标题发表，矛头直指清朝皇帝载湉。这下当道者真的“受不了”了，清朝当局查封了《苏报》，章、邹分别被判处监禁3年和2

年，制造了轰动一时的《苏报》案。1905年，邹容在狱中被折磨致死，1906年，章太炎刑满释放。清政府企图通过这一事件压制舆论以达到镇压革命的目的，然而事与愿违，通过“苏报案”，《革命军》的销行更广，革命风潮日盛。

《苏报》案发后，陈范在友人的帮助下逃到了日本。在横滨山下町寓所，陈范终于见到了他心仪已久的孙中山，孙中山对革命的见解，使他很受教育和鼓舞。1904年冬，冯自由、梁慕光、胡毅生等人在横滨组织洪门三点会，陈范携其二妾和女儿陈撷芬与会。后来，洪门策划和参与多起武装起义，陈范积极奔走，为武装起义募集资金，声援国内的反清斗争，为革命做了不少事情。

1905年夏，陈范从香港回到了上海，谁知竟是自投罗网。陈范在狱中被关押了一年多，经多方营救才被释放。湖南光复后，陈范与汪文溥共同参加了湘桂援鄂联军，可是联军司令沈秉堃毅力不足，又无远志，陈范对他很失望，于是离开湖南回到了上海。

1909年，他加入了柳亚子等发起成立的南社，与柳亚子等写出了许多抨击反动统治、悼念革命先烈、缅怀民族志士的诗歌。1912年6月，陈范又与柳亚子、高天



1916年“上海南社”合影

梅、叶楚傖、李叔同等15人发起组织了国学商兑会，目标是要在西学东渐的大潮冲击下，担当起保存国粹进而担负起国学重建的责任。

上海光复后，陈范和他的亲友们又一次活跃于上海报界，他在任笔政的《太平洋报》上接连发表了一系列政论文章，宣扬共和，力图将中国引向现代国家的轨道。民国建立后，陈范多年的愿望实现了，但他不以功臣自居，而是闭门蛰居，潜心写诗作文。在陈范生命的最后岁月里，他就是靠写诗文和小说换取养老之资，免于饥寒。

1913年5月16日，一代报人陈范在贫病中与世长辞，终年54岁。死后竟“无以为殓”，靠着亲友的捐赠，才将其遗体装殓。

## 舆论先锋汪文溥



汪文溥

汪文溥（1869—1925），字幼安，号兰皋，出生于常州的一个书香门第。他才华横溢，擅长诗词，精书法，写得一手好文章。他娶陈范妹妹陈德辉为妻。1899年陈范接办《苏报》之后，让汪文溥入报馆任主笔，协助自己从事报业经营，汪文溥从此开始与政治结下不解之缘。撰有《来台集》、《汪文溥日记》、《桃源痛史》等专著。

### 革新《苏报》倡言革命

报刊的格调取决于馆主与主编的办报思想和社会责任。《苏报》在1900年汪文溥担任主笔（主编）之前，是一份专门以刊载市井琐事为主的报纸，销量极少，在社会上没什么影响，处于倒闭的边缘。自从陈范、汪文溥接手后，《苏报》的思想内涵有了质的改变，从中反映出来的信息，透露出了汪文溥、陈范与国家存亡同呼吸、共命运的忧患意识。这正满足了社会上先进知识分子迫切想要国家强盛的心理，赢得了他们的共鸣，《苏报》便因此而走出困境，开始在社会上产生出广泛的影响。

汪文溥是陈范的妹夫，他们在办报的认识上都经历

了一个从保皇到革命的转变过程。汪文溥最初是想“以清议救天下”，追随康有为、梁启超维新变法，宣传保皇立宪，希望清政府通过“政治改革”和自身“机体的净化”来去除毒瘤的扩散。但接连发生的两件大事，让他深受刺激，一是八国联军入侵后签订的《辛丑条约》使中国的政治、经济完全被帝国主义势力控制；二是1902年广西巡抚王之春以让出广西矿产权利为条件，“借法款、法兵”，镇压广西人民起义，从而激起国内拒法运动。这两件事让他彻底认识到必须用暴力革命手段推翻封建统治，中国才有光明的前途。此时又正好发生了南洋公学“墨水瓶事件”，《苏报》以此为切入点，开始了革命思想的宣传。

1902年11月发生的墨水瓶事件，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一个有影响的事件。从表面上看，似乎是文科老师郭镇瀛，认为学生用墨水瓶捉弄他，因而强行开除个别学生，由此引发200多名学生抗议、退学，但实质上是爱国学生接受的西方资产阶级民主自由思想与校方坚持的封建专制礼教发生严重碰撞的结果。汪文溥坚决支持学生的斗争，与陈范商量后，专门在《苏报》上增辟“学界风潮”专栏，开始了他以革命思想为中心的舆论宣传。



爱国学社开学

这个事件促使了汪文溥与上海两个革命团体——中国教育会和爱国学社的深入接触，他与蔡元培、吴稚晖、章太炎、黄宗

仰等革命者面对面探讨中国的前途命运，加深了对革命理想的认识。为了把革命思想传播给广大民众读者，他定期约请蔡元培、章太炎、吴稚晖等以两个革命团体的名义，为《苏报》撰写革命言论文章，同时自己也加入到这个行列中。《苏报》先后发表了《军国民教育会公约》等有影响的文章，其中有一篇《敬告守旧诸君》的文章，公开倡言革命，称“居今日而欲救吾同胞，舍革命外无它术，非革命不足以破坏，非破坏不足以建设，故革命实救中国之不二法门也”。这篇文章成了第一篇倡言革命的战斗檄文。所以冯自由撰的《革命逸史》对汪文溥、吴稚晖、章士钊诸人有“持论激烈，清吏视之有同蛇蝎”的评论。

### 巧妙周旋掩护革命

1903年，汪文溥到湖南任醴陵知县。这里受华兴

会“驱除鞑虏，复兴中华”的思想影响较深，革命气氛浓烈。这时，在日本加入同盟会的醴陵人宁调元回乡，暗中与洪江会首领李香阁、龚春台等串联，酝酿武装起义。汪文溥得到报信后，不向上峰反映，装聋作哑扮“糊涂”，任由李香阁他们活动，使这一地区成为同盟会组织第一次大规模武装起义的策源地。

1906年12月4日，萍浏醴武装起义爆发。清政府调集湖南、湖北、江西、江苏四省的清军及地方驻军共5万人前往围剿；美、英、德、日各国也派军舰闯入长江，对起义军进行恐吓。由于武器装备极差，缺乏组织领导，起义军奋战一个多月后，被清军各个击破，惨遭失败，被杀一万多人。

起义失败后，有很多义士被关押在醴陵的监狱内，汪文溥巧妙周旋，千方百计保护他们，使很多“被捕者赖以活命”，结果他自己遭到了地方反动劣绅的责难，被控为革命同道的“党徒”遭关押审查，后因找不到具体确凿的证据，清政府只将其革职不再叙用。汪文溥离开醴陵到长沙，在湖南洋务局谋到了一个差事。在获悉会员宁调元被关押在长沙监狱的消息后，汪文溥不怕牵连，立即打通关系前去探视。

萍浏醴武装起义爆发后，宁调元受东京同盟会本部

派遣，回国策应革命，先到上海，与陈其美、秋瑾等磋商，决定分头动员长江一带的革命力量相机行动，响应萍浏醴武装起义。不料行至岳阳，落入清军手中。汪文溥去探视他时，宁调元已做好了慷慨赴死的准备，写下了《绝命词》。汪文溥了解这个情况后，劝他不要无谓牺牲，要他沉着应付，千万不能承认自己是革命党。宁调元听了汪文溥的劝告，在堂上死不承认自己是革命党，并在狱中“运动、读书、习字、作文”，创作了大量诗文。汪文溥在外面为他奔走筹划，疏通关系，贿通官吏，使这个政治案子拖了三年也未有结果，最后放人了结。

### 主办“民声”倡导实业

汪文溥自醴陵被革职后，不再隐瞒革命的态度，直接走向了革命的前台。

1911年4月27日，广州黄花岗起义爆发。汪文溥得知后，立即联络湖南革命党人焦达峰等，决定宣布起义以呼应。因有人告密走漏风声，汪文溥被湖广总督瑞澂逮捕下狱。多亏陈范四处托人相救才平安出狱。事后，他效仿苏东坡词风，为黄花岗之役死难的72烈士写下了一篇《大江东去》的词，寄托自己的哀思。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长沙，汪



文溥大喜过望，即参与革命党焦达峰、陈作新等召开的秘密会议，部署湖南响应计划。10月22日，湖南宣布独立，成为武昌起义后率先响应的一个省。这时清政府派军南下，武汉告急，汪文溥心急如焚，为保武昌革命硕果，他竭力游说焦达峰尽快组织部队赴武汉支援。焦达峰、陈作新认识到情况紧急，果断作出派兵增援的决定，但因10月31日焦、陈两人被暗杀未来得及实施。汪文溥在焦达峰、陈作新遇害后加入了广西都督沈秉坤率领的湘桂援鄂联军，任联军司令部书记官。汪文溥一心想以革命的合力，推翻封建王朝，殊知事与愿违，现实让他大所失望，于是他辞去书记官，回到了上海。

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宣布成立。汪文博加入了由黎元洪、王正廷、蓝天蔚、孙武等人在上海发起成立的中华民国政党——民社。民社以“图共和政体健全之发展”为宗旨，推黎元洪为首脑，吴稚晖为总干事，是南京临时政府时期中国最有影响的政党之一。民社的党报叫《民声日报》，汪文溥先任编辑，后任主编，该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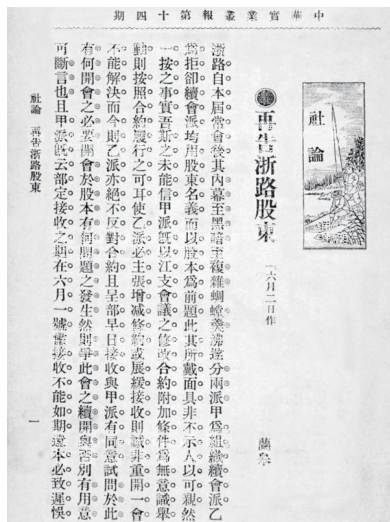


南社丛刻

中有很多言论文章都是他亲自撰写，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黎元洪北上后，《民声日报》停办。汪文溥又加入了另一个有重要影响的资产阶级革命文化团体——南社，常在《南社丛刻》上撰写社论和诗词。

中华民国成立后，汪文溥对中国的前途不无思考，他认为建设新社会，归根到底“非实业不足以立国”，中国的出路主要在于兴办实业，增强经济实力，只有通过实业救国这条道路，才可以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为了引起全社会广泛关注和重视兴办实业，他与吴稚晖等于1913年5月1日在上海创办了一份《中华实业丛报》的

杂志并任主编。他凭借这个舆论平台，呼吁国民政府要关注民生，重视工业、农业、金融、商贸业的发展，对有利于增强国家经济实力的实业，政府要尽其所能，全力扶植，让其自由发展，而不是“妄加干涉”。他的很多主张得到了工商界的广泛好评，使刊物成为民国初期最为重要的经济类月刊。



中华实业丛报

汪文溥的一生是在政治颠簸中度过的，凭他的聪明才智完全可以过上富裕安逸的生活，可他却冒着坐牢、杀头的危险，干起了革清政府命的事儿，这正是常州知识分子在国家处于危难时刻体现出来的一种宝贵的精神和品质。

## 新政体的推动者孟森

孟森（1869—1937），字莼孙，号心史，常州人，战国时期的伟大思想家、儒家代表人物孟子的七十一世孙。他早年上海南洋公学译学馆主持译书事务，后被广西龙州边防督办郑孝胥所用，撰写《广西边事旁记》一书得到赏识，被



孟森

资送东京政法大学学习。回国后，呼吁政体改革，从事立宪运动，主编《东方杂志》，武昌起义后，牵线立宪力量支持革命。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后，任黎元洪为首的共和党执行书记，1913年4月当选为国会参议员。因主张实行责任内阁，限制总统权力，遭袁世凯通缉，逐渐脱离政治活动，致力于史学研究。他一生的革命生涯和学术生涯同样辉煌、可圈可点。

### 勇立立宪运动潮头

1906年3月，孟森东渡进入东京政法大学学法律。年底，孟森与其弟孟昭常学成回国，在上海竖起了一面敦促清政府速开国会，实行君主立宪的大旗，筹组成立

了中国最早、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立宪政治团体——预备立宪公会。其会员主要是上海及江浙商界、学界的精英，郑孝胥任会长，张謇、汤寿潜任副会长，孟昭常、孟森任驻会干事（相当于正副秘书长）。

预备立宪公会看上去是社会名流郑孝胥、张謇、汤寿潜等在挂帅、主事，但实际上，他们对如何参照西方法律改良中国的政体，并无多少发言权，会里大小事务都落在孟氏兄弟等一班留洋学生的身上。孟氏兄弟学有所用，发挥了生力军作用。在他们的鼓动下，公会吸引了大量的年轻人入会，成员由最初50多人发展到近350人。曾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的黄炎培有一个中肯的评价，说预备立宪公会“开讲习会，必请几位先生为讲师；修订章则，非请这几位先生起草不办”。这是对孟氏兄弟作用的客观评价。他们在“留日学生中颇负盛名”，在立宪运动中起着中流砥柱的作用。

预备立宪公会成立后，孟森为了搭建推进政体改革的舆论平台，一方面与弟弟一起创办“研究理论达于实用”的《预备立宪公会报》，在该报上撰写发表《论中国今日有可以速开国会之理由》等宪政文章，另一方面进入商务印书馆接办《东方杂志》，与《预备立宪公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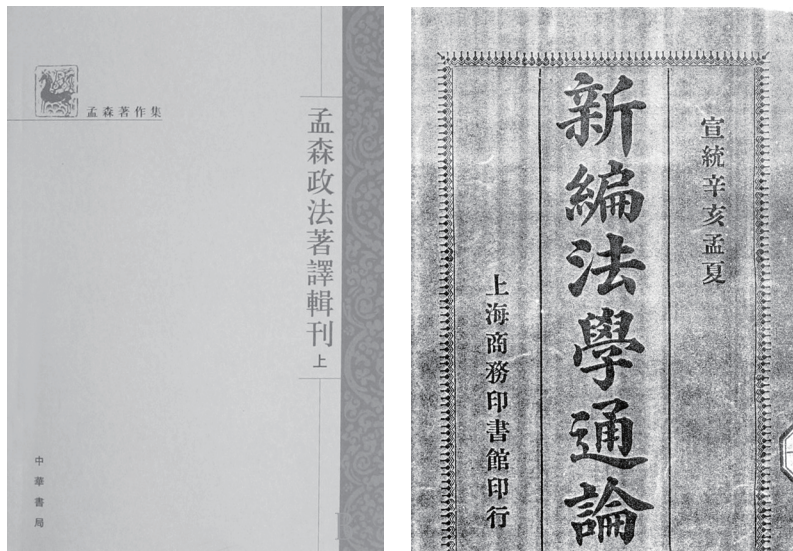
报》遥相呼应。

1904年创办的《东方杂志》月刊，原来只刊登“上谕”、奏折以及文人墨客诗词，在社会上没有影响。孟森接掌这份杂志后，办刊风格顿时改变。他在《东方杂志》上首开《宪政篇》专栏，以自己丰富的法学知识，介绍先进国家的立宪制度，论述中国如何走立宪之路。他指出“宪政筹备不能据官方文书为定评，必须社会监督，始有实效”，强调“以议院为国家立法机关，以政府为国家行政机关，以法院为国家司法机关”，实行三权分立是势不可挡的趋势。这些时论使该刊一下子转变为宣扬宪政改革和主张地方“自治”的重要政治刊物，与《预备立宪公会报》一起，成为立宪运动中两大喉舌，兄弟俩也因此成为风云人物，名扬全国。

### 发起请愿速开国会

1908年7月8日，清政府迫于全国立宪的呼声，决定先从地方自治开始，由资政院向全国颁布咨议局（省议会）及议员选举章程。孟森抓住这个时机，立马行动，率先在上海（当时属江苏）江苏教育会法政讲习所举办全国培训班，为各地代表详细讲解《咨议局章程》以及成立咨议局的操作步骤。随后他将讲课内容编辑成《咨议局章程讲义》出版发行，供各地筹备成立咨议局作参

考。他在这一期间撰写的《法学通论》、《咨议局章程笺释》、《城镇乡地方自治详解》、《地方自治浅说》等书，成为全国开展立宪政治的指南。



孟森法学著作

孟森在普及宪政知识的同时又率先实践，筹备成立了江苏地方参政机关——江苏咨议局，希望以此作为样板，让各省参考借鉴。

咨议局的议员选举，孟森主张效法日本，采用复选方式，先由选民选出若干候选人，再由候选人互选产生正式议员。为了让各地选出来的议员，能真正发挥议政能力，他对参选议员提出了明确标准：一要在本地办学及其他公益事务方面从事三年以上实际工作，且有

政绩；二要有本国和外国中学堂或同等学历，具有较高文化素养，具备议政能力；三要在本地拥有五千元以上营业资本或不动产。同时明确指出，品行不端、有污点或从事贱业者不能成为候选人。通过这样的硬性规定，江苏咨议局当选的议员，基本都是各地有声望的精英人物，如武进、阳湖两县产生的屠元博、朱稚竹、钱以振、赵衡、于定一、孟昭常六位江苏省咨议局议员，他们在各自的行业里都有相当的建树。

因筹组江苏咨议局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909年9月1日，江苏咨议局成立时，孟森被推选为书记长（秘书长）。

江苏咨议局在全国是最早成立的，是各省咨议局的领头羊，后来组织全国三次请愿，都是由江苏咨议局牵头联络，而孟森作为秘书长，更是功不可没。

宪政改革从地方开始如火如荼地展开，但中央却迟迟没有动静。孟森与弟昭常等立即起草了一份《请速开国会建设责任内阁以图补救意见书》，分发各省征求意见。随后他代表江苏于当年秋前往奉天（辽宁）、吉林、黑龙江、直隶、山东等省串联，联合各省咨议局商量发起请愿，逼清政府尽快开启国会，成立立宪政府。

1909年12月，孟森又与张謇一起邀请奉天、吉林、



黑龙江、直隶、山东、浙江、福建、广东、广西等15个省的咨议局代表到上海开会，研究确定请愿方案，会议要求清政府缩短立宪年限，迅速启动国会，组织责任内阁，同时组织成立由各省选派代表参加的国会请愿同志会，赴京请愿。在三次请愿活动中，孟森始终代表江苏，担负起联络、协调、组织等工作，成为重要的骨干成员之一。

### 促成立宪力量投向革命

武昌起义枪响，孟森迅速从君主立宪转到民主共和的主场上来。他提醒那些对皇帝仍抱有幻想的立宪党人：是皇帝重要，还是国家重要。他经常与赵凤昌接触，所谈所议的就是革命党人与立宪派联合和清帝退位等问题。张謇、汤寿潜等最初与黄兴合作，就是孟森与赵凤昌商量好后，由孟森出面牵线搭桥，促成立宪派与革命党联手的。在武昌起义后，清政府组织兵力反扑的关键时刻，又是上海、江苏、浙江表明立场，在11月初宣布独立。由于有了以上海为中心的江浙沪立宪派政治力量的有力支持，才使全国的政治形势朝着有利于革命的方向发展，实质上江浙沪立宪派的转向，对加速清皇朝灭亡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孟森在辛亥革命中，不仅在立宪派与革命党的政治

合作中起着桥梁作用，还为江浙沪联军攻打盘踞南京的张勋拟写通电檄文。

11月5日，江浙沪三地民军都督程德全、汤寿潜、陈其美汇集苏州，决定组成联军，铲除张勋等部。在发起进攻之前，要先通电全国。电文谁来拟？大家的目光都投向了孟森。孟森不推不让，随手挽起袖子，稍一思索，便饱蘸浓墨挥毫完成了一篇千字檄文。谓：“日夜所希望，惟求改专制为立宪，使吾中华大国，得一位置于列强之间”，今日“欲求政体之廓清，端赖国体之变革”，这已经成为大多数国民的迫切愿望，作为国民，“无汉无满，一视同仁，为国为民，务求在我，将泯贵贱亲疏为一大平等，即合行省藩属为一大共和”。

这篇檄文对建立民主共和充满期待，希望人们以民族大义为重，避免流血，不要再因战争殃及无辜的百姓。

### 起草中国第一部宪法

民国成立后，孟森积极参与筹建共和党，任常务干事（相当于秘书长）。

1913年1月，孟森在江苏第三区当选为中华民国国会众议院议员，4月，北上参加第一届国会会议。5月，共和党、统一党、民主党合并组成进步党，孟森与黎元



中华民国宪法起草委员会合影（二排右四为孟森）

洪（理事长）、梁启超、张謇、伍廷芳等同属该党。7月，他又被选为国会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参与了中华民国第一部正式宪法《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即“天坛宪草”）的起草工作。在议决政府组织形式时，孟森竭力主张实行责任内阁制，限制总统权力，由内阁控制国家实际权力，代表国家元首向议会负责。

袁世凯不甘心大权旁落，他既想任国家元首，又要担任政府首脑，且不对议会负责。于是暗中指使亲信游说、收买议员。多数议员迫于袁世凯的淫威，仰其鼻息行事，最后以多数票赞成通过实行总统制的议案，孟森与宋教仁等成了个别几个主张责任内阁制的“孤家寡人”。

这部宪法草案于同年10月公布，不到一个月，袁世

凯就开始借“二次革命”“乱党祸国”之名，开始向限制其权力的人开刀。他先是强行撤销了国民党籍议员的议员资格，使国会不足法定人数，陷于瘫痪状态，随后要求国民党议员宣布脱离国民党后才能离开北京。孟森虽然是进步党议员，但因主张实行责任内阁制，也被列入通缉名单。

孟森知道一旦落入袁世凯手中会是什么结果，在通缉的当夜便伪装成商贩，逃离京城到上海，躲在他弟弟孟昭常民友社的仓库里。

经过这次折腾，孟森从政之念有所减弱。从此，他逐步开始转向，把主要精力放在历史研究上。1914年，他以“心史”的笔名，陆续发表清史的论文，1928年入中央大学任教，1930年入北京大学任教，讲授《满洲开国史》等课程，直至去世。他是中国清史学科的杰出奠基人，撰写《清朝前纪》、《满洲开国史》、《明代



史》、《清史讲义》、《明元清系通纪》（十五卷）、  
《心史丛刊》、《清初三大疑案考实》、《八旗制度考  
实》、《明清史论著集刊》等专著数十本，上千万字。

## 公民意识的启蒙人孟昭常

孟昭常，1871年出生在常州的一个没落的知识分子家庭。他14岁丧父，靠兄长孟森做塾师维持生计，后辍学到一家布庄学徒，自食其力。他一心想读书，一有空便捧着书读个没完，布庄主人很不高兴地说：你若



孟昭常全家在哈尔滨合影

中得举人，我请你看三天戏，喝三天酒。未料，21岁那年，他果真考取举人。布庄主人兑现承诺马上请人唱戏三天，设宴招待孟昭常，向他作揖赔礼，一时成了常州城里的佳话。后来，孟昭常与兄长孟森同去日本留学，专攻法学。回国后，孟昭常成为立宪运动的骨干，先后在上海、北京等地创办《预备立宪公会报》、《宪政日志》，大力倡导民主宪政，组织全国各省的立宪派成员向清廷请愿。中华民国成立后，任工商部参事，1914年起，走实业救国之路，赴东北垦荒，1917年任黑龙江实

业厅厅长。

### 高擎政体改革的旗帜

1906年底，孟昭常从日本留学回国后，加入了预备立宪公会，任驻会常务干事（相当于副秘书长）。

孟昭常把预备立宪公会当作施展才能、推动清政府政体改革的舞台，经常在上海组织安排演讲，宣传介绍有关法律知识，灌输民主宪政思想，吸引了大批青年入会，使公会成为当时中国人数最多、影响最大的立宪政治团体。1908年，预备立宪公会改选，孟昭常当选为副会长。

孟昭常认为，要想推动清政府顺应民意加快立宪步伐，必须要有强大的舆论工具。为此他先后创办主编了两份重要刊物，一份是《预备立宪公会报》半月刊，还有一份是《宪志日刊》（后改为《宪报》）。

《预备立宪公会报》创刊于1908年2月29日，总发行所设在上海，在全国50多个城市设有销售点，在日本东京、南洋华侨聚集地等都有销售处。该报内容涉及宪法、行政、法律、财政、外交、交通、教育等方方面面，撰稿人几乎都是毕业于日本法政大学的高才生。孟昭常最为活跃，他站在舆论阵地的前沿，对中国的政体改革、宪政制度建立等重要问题提出了设想：一是对未

来君主立宪的政体变革，不能照搬任何一国政治制度。他只主张学习日本进取精神，而立宪应“以人民为组织国家之要素”，组织强于皇权的议会，才能削弱皇帝一言九鼎，打破“君权神圣”的封建专制制度。二是主张在未来君主立宪国中，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应先完成地方自治，积累处理地方政事的经验。等地方自治充分发展后，再开国会，选举议员，参与国政。同时还主张要以省为最高自治单位，实行地方分权，“以地方之人，就地地方之财、办地方之事”。三是要给人民选举和被选举的公民权利。针对当时提出的普通、限制、团体、等级、复数五种不同选举主张，他认为只有复数选举最适用于中国。所谓复数选举，就是由国家确定一最低税额作为选举资格税额，对达到最低税额及学识优秀的人，给予选举权，以体现公民的基本选举权利和政治地位。四是主张君主立宪不能忽视少数民族利益，“蒙藏之存亡，即关中国之存亡”，在国会中要增加蒙、藏议员的数目，让其表达民族利益的诉求。五是对教育要引起足够重视。教育应突出国民，注重全社会的普及和推广，而国民教育的核心，是要“培养具有新道德的公民”和“有进取精神以及爱国思想的人”。

在面对清政府利用“国民知识程度低下”等借口，



拖延召开国会时，孟昭常以公民代言人自居，发挥公民意见的作用，使公民意见第一次成为掣肘行政权力的力量。他为了把“专制政体无责任之民”改造成“立宪国之公民”，在主编《宪志》时，力求把国会理论演绎成白话，让那些女人和小孩都容易懂。孟昭常的舆论攻势，让清政府感到了很大的压力，只得将迟迟未运转的资政院从速开院。

### 首倡“公民”观念

孟昭常认为，鉴于中国长期处于君主专制政体统治下，要想让中国社会走上民主政体道路，这绝对不是少数人的努力、呐喊就能够实现的。要想做到这一点，先要开启民智，唤起民众对立宪运动的认知，动员全社会的公民积极参与。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他以预备立宪公会为平台，创设了出版部，组织留日学法的孟森、钱润、邵羲、汤一鶚、沈其昌等翻译、编辑出版了《日本宪法详解》、《选举法要论》、《地方自治制纲要》、《地方行政制度》、《议员要览》等一大批宪政书籍。其中影响最大的还数他亲自撰写的《公民必读初编》、《公民必读二编》两本书。

这两本书在社会上推出后，受欢迎的程度，简直可用史无前例来形容。当时广西巡抚署一次就订购了10万

册，河南巡抚署一次订购1万册，在短短两年时间内，重印达27次之多，创下了中国近代出版史上的一最。

这两本书如此热销，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冲击”了君权思想，唤起了民众要求参与“公权”的愿望。孟昭常率先站出来冲击“君权”，第一个把“公民”一词引入中国，改“臣民”为“公民”，替老百姓争取公民政治地位和权利，在“黑夜中开启一盏指路的明灯”。

孟昭常呼吁一国之民都应该享有参政权，这正顺应了民众长期受压要求自由平等的心声，受到了很多人，尤其是新知识分子的推崇。后来他当选资政院议员，是为数不多的几位年轻议员之一，也是国会里真正能发挥参政议政能力的议员之一。

### 修订完善国家商法

1904年1月，由农工商部尚书载振、修订法律大臣伍廷芳、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等编订的《钦定大清商律》向全国颁行。这部商法脱离中国实际情况又没有征询商界意见，公布后遭来全国一片非议之声，成了一部无人问津、丢进垃圾堆里的废法。

孟昭常认为，商法主要是规范商业活动的，在制订过程中，首先要与商人组织特别是各地商会保持密切沟通，充分重视商人组织在立法过程中的参与作用，才能

行之有效。因此，他以民间的力量，扛起了这个重任，在预备立宪公会内设商法编辑所，亲自撰写了《商法调查案问答》，并联络全国商界，在上海召开了两次专门讨论商法编辑问题的全国性大会。在第一次商法大会上，他和与会代表共同确定了商法编订的主要内容以及编订次序，确定第一编为公司法，第二编为契约法，第三编为破产法，第四编为商行为，第五编为手形法（即票据法），第六编为海商法，第七编为总则，并通过了《商法草案提纲》。会后，他作为主要编纂人之一，于1908年12月编制完成公司法草案，分送各地商会征求意见，随后邀请各地商会派代表到上海开会讨论。1909年12月又编成商法总则编。1909年12月19日，第二次商法大会在上海召开。会上，各商会代表对于草案进行了认真的讨论。最后，大会公推孟昭常、秦瑞玠二人在完成草案修改后，作为全权代表，赴京与清政府接洽。同时要他们加快对其它还未完成部分的编纂。

嗣后，孟昭常将《商法总则》与《公司法》合称《商法调查案》，上呈清廷农工商部。这时清政府法律修订馆因《钦定大清商律》不适用，也正在重新修订《商律草案》，于是农工商部就把孟昭常等编纂的商法，推荐给法律修订馆，用作主稿。法律修订馆总纂

董康等根据这个稿子稍加修改，定名为《大清商律草案》，呈资政院审议。

该法分总则、商行为、公司法、海船法、票据法五大部份，共1008条。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商事法典，但未来得及颁布，辛亥革命爆发，此草案被搁在一边。中华民国成立后，采纳该草案，将它修改成《商人条例》、《公司条例》，先行颁布施行。

### 推动地方自治

迫于全国要求实行“三权分立”（立法、司法、行政）的舆论压力，1908年7月22日，清政府颁布了《各省咨议局章程》、《咨议局议员选举章程》等文件。孟昭常立即行动，利用《预备立宪公会报》大力宣传地方自治的有关法律知识，撰写发表了《咨议局选举章程问答》、《选举法要论序》、《城镇乡选民资格论》等多篇文章。同时还担负起了为全国各省培训咨议局骨干力量的职责，在上海（当时属江苏管辖）江苏教育会法政讲习所举办全国培训班，招收各省学员，专门培训地方自治会议员、会董，为各地加快推行地方自治进程培训人才，并就选举过程中的运作模式和推行地方自治提出了指导意见，为各地开展自治、选举指明了有效的途径。

孟昭常在这一政体变革的过程中，发挥了引路人的作用，亲自撰写的《地方自治纲要》，曾经风行一时，深受社会欢迎，先后再版15次之多，另一本《城镇乡地方自治宣讲书》，因满足了各地筹备自治的实践需要，更是一版再版，畅销全国。孟昭常是民间法制进程的推动者，为启发民众参政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1909年9月1日，江苏省咨议局成立，推荐张謇任议



江苏咨议局大楼

长。省议员由各县按人口比例选举产生，孟昭常在地方的选举中脱颖而出，与省社团直选产生的兄长孟森，成为省咨议局少数几位常驻议员。从此，他们兄弟两人又借咨议局这个平台，利用自己精通国外政体知识的这一特长，将咨议局议决机关的权限发挥到了极致。在议会

的监督制约权上，孟氏兄弟提出了州县官吏不得向上赠送“节敬乾修”、“免派官报”等养廉议案，还申明咨议局具有参与“丁漕征收、田房契纸牙贴、盐务厘课、警务、地方自治、调查户口、水利工程、教育农商”等十大类事项的省立法权，省内的预算支出必须经过咨议局议决才能执行，使总督、巡抚权力过大、官吏滥用职权现象得到一定的抑制。

### 担当请愿尖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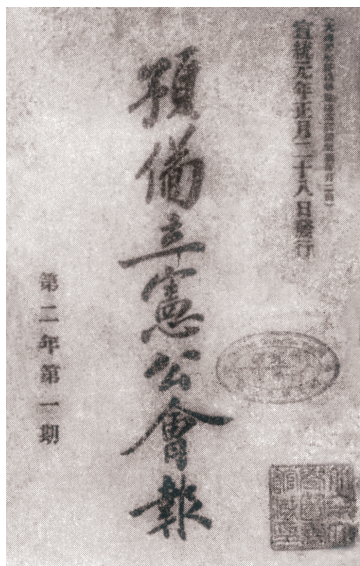
成立各省咨议局，是清政府借“地方自治成为行宪条件”，推迟中央开设资政院，延缓清廷专制的缓兵之计。资政院开院最初定的时间是1920年，不料，孟氏兄弟在江苏咨议局成立一个月后，就起草完成了《请速开国会建设责任内阁以图补救意见书》，分发全国各省，联络各省咨议局推动全国请愿。兄弟俩与杨廷栋等人以江苏省咨议局局长张謇的名义，分赴奉天、黑龙江、吉林、直隶（河北）、山东、浙江、福建、广东、广西、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等省咨议局，进行广泛联络，要求各省派代表到上海开会研究，拟订请愿书，形成合力，联合向清政府请愿，敦促清政府速开国会。

1909年12月初，16个省的50多名咨议局代表聚集上海预备立宪公会，研究请愿方案。会上对孟氏兄弟起草

的请愿书进行讨论，同时推定福建咨议局副局长刘崇佑为主席，组成33人赴京请愿代表团。江苏代表是孟昭常、雷奋。

1910年1月16日，孟昭常等请愿代表，肩负全国20万人（在请愿书上的签名统计）的重托，赴京向都察院呈递了请愿书，要求清政府在一年之内召开国会，组成责任内阁。清政府借口筹备工作来不及、国民知识程度低下，拒绝提前召开国会。

针对顽固不化的清政府，孟昭常又在《预备立宪公会报》上发表了《致各界书》，向全国教育界、商界发出参与国会请愿倡议，动员全社会的舆论向清政府施压。随后征集到30万人的签名，组成了由80余人的请愿代表团，于同年6月16日第二次向都察院请愿。结果清政府仍以财政艰难、地方偏灾、匪徒滋扰为由给予拒绝，并严令不得再行请愿。可是，这时的民众已被孟昭常等发动起来，参政意识日趋强烈，民意已经到了势不



预备立宪公会报

可挡的地步。孟昭常等乘势组织了第三次请愿。清廷面对排山倒海的舆论声势，终于不胜压力，答应成立内阁，召开国会时间由原来9年缩短为5年。孟昭常等组织的请愿运动获得了全面胜利，孟氏兄弟俩成了立宪运动中的风云人物。

### 转向实业救国

辛亥革命爆发后，留在南方的兄长孟森即致函他南归。于是，孟昭常移居上海。1913年，张謇出任北洋政府农商总长兼全国水利总长，邀请孟昭常北上，任农商部参事。1915年12月，他的好友、有“报界之奇才”之称的黄远生因政治观点不同被刺身亡，这对孟昭常刺激极大。从此，他辞去参事退出政坛，学张謇身体力行走“实业救国”道路，赴东北黑龙江创办“近思”垦荒公司。他将杂草丛生的万顷荒地改造成良田，并利用农场所产大豆等农产品，创办了油坊、酒厂，实行一体化经营。通过几年经营，近思公司一跃而成为5个垦荒公司（火犁、东井、广信、智远）中发展最快、规模最大的公司。此后他被推任黑龙江实业厅长。

沙俄帝国侵占哈尔滨后，在中国领土上修建了中东铁路，俄国人开始在哈尔滨铁道之西聚居，称“道里”，而中国人主要聚居在铁道之东，称“道外”。道





30年代道里道外老地图

里洋商集中，逐渐形成了商埠，比较繁荣，而道外则荒凉简陋，商业萧条。孟昭常考察后发现，道外地理位置优越于道里，因为轮船载运农产品，沿松花江到哈尔滨，只能停泊在道外的江边卸货，道里受江上横架的铁路桥限制，轮船开不进去。但道外由于市场发育不健全，没有购销农产品的贸易机构，缺乏资金，农产品又经常滞销，不得不求助道里的洋商。孟昭常看到了这个商机，参考日本《取引所章程》，借鉴日本的做法，联合山东殷实富商，在“道外”创办了一个“取引所”，并将日文用的“取引”译成中文的“信托”，定名为“道里农产品信托公司”。这是中国第一次使用“信托”两字，

也是中国第一家信托公司。孟昭常在创办信托公司的同时，还创办农产银行作为一体化运作配套，使农产品收购、销售、贷款等都可以在道外地区一次性解决，不必再求道里洋人交易。从此，道外市场也逐渐活跃起来，并带动了市政、房地产以及工商业的发展。孟昭常创办信托公司成为哈尔滨道外走向繁荣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孟昭常积累起财富后，凭着一腔爱国热情，开始筹划收回由沙俄控制的松花江、黑龙江的航行权。友人对他的举动很不理解，劝他“收回航权是国家之事”，让他不要去冒险，他用“收回航权，人皆有责”予以回答。他从交通银行借得巨款，凑足270余万银元，从俄商手中买下了40余艘轮拖船，创办了黑龙江省第一家中



松花江岸边码头

国轮船公司，并将轮船统统改成“常州号”、“武进号”、“阳湖号”、“苏州号”、“宜兴号”等中国名字。

在反动军阀统治的年代，他的爱国壮举不仅没有迎来掌声，反而遭来了灾难。早已觊觎他财富的军阀与日商勾结，以种种理由设置障碍，使他的轮船公司无法正常经营，最终全部被军阀控制。1918年孟昭常在郁闷中猝死，年仅47岁。

## 新闻革命的先贤狄平子

狄平子，原名葆贤，字楚青，号平子，常州溧阳人，1873年出生于其父狄学耕江西赣县知县任上。狄平子自幼聪慧活泼，学书习画、吟诗作文，志存高远。史家学者称他集“五人”于一身：举人、党人、才人、报人、佛门人。



狄平子

19世纪90年代狄平子日本留学期间，与康有为、梁启超等过从甚密，“公车上书”他名列其中，以至于有人把他也当成了康的弟子。狄平子还结识了谭嗣同的同乡、同学兼密友的《湘学报》主笔唐才常，交往日频，遂成莫逆。他们思想上同属维新派左翼，与孙中山领导的兴中会成员多有联系，主张以武力推翻清朝统治。为此，他参与创建“自立会”，组织“自立军”，准备发动武装起义。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狄平子和唐才

常等人一起回国，在上海成立“正气会”（后改“自立会”），明里教授日文，暗中作为起义机关，接待各地来沪同志和会党首领。经费不足，狄平子不惜变卖自己珍贵的家藏书画充作会费。可是，当他在香港募款购得一批军火，历尽千辛万苦运抵汉口时，惊闻自立军起义已被残酷镇压，唐才常等慷慨就义。百般无奈之下，狄平子潜回上海逃避追捕。

1907年，预备立宪公会在上海成立，入会者皆当时精英，东南工商界、出版界、教育界的重要人物几乎囊括其中，狄平子与高梦旦、张元济、孟昭常、孟森等都参与其中。

### 主办新闻《时报》

变法和起义都失败了，狄平子悲愤异常。痛定思痛，他决定改弦易辙，从事新闻出版事业，作文字上的宣传鼓吹，以革新舆论、启发民智来改造社会。

光绪三十年四月二十九日（1904年6月12日），狄平子主办的《时报》以崭新的姿态在上海这个报业中心横空出世，“突然似放一异彩”。流亡日本的“钦犯”梁启超潜赴上海，直接参与该报的命名，撰写发刊词，确定体例。虽然《时报》筹备期间，康有为一次拨给创办费7万元，到1908年累计拨款20万元，但《时报》



《时报》

始终坚持非党派的办报方针，挂的虽是日商的牌子，实际上是独立办报。梁启超起草的“发刊例”第一条即主张“以公为主，不偏徇一党之意见”，并主张“有闻必录，知错必改，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时报》作出这一选择，康有为的保皇会少了一个喉舌，暗淡的晚清中国则多了一份真正有品质的新闻报纸。著名报人徐铸成评价说：“狄平子很有魄力，为打开一条‘文人论政’的道路，的确也作出了成绩的。”

为了办好报纸，狄平子一是延揽人才，聘请头脑较新的陈冷血（景韩）为主笔，包天笑、戈公振等为编辑，这些人都是当时之俊彦。二是独创体裁。首辟“时评”专栏，所谓“时评”，原意仅指《时报》的评论，后来各报竞相仿效，“时评”便成为时事评论的意思，

且一直沿袭至今。此外如“特约通讯”、“副刊”也都是《时报》的首创。又设教育、实业、妇女、儿童、图画、文艺等周刊，并加“余兴”一栏，亦为各报所踵行。还撰写《福尔摩斯来华侦探案》等长篇小说，逐日连载，以吸引读者。三是改革版面。以往的中国报纸大都是把几个版面的内容印在一纸的平面之上，《时报》则打破成例，首创对开报纸，把一张报纸分成四版，两面印刷，每个版面分栏设目，各有一定的规范。栏目标题字体有别、大小不同，十分醒目，方便阅读……《时报》以初生牛犊不畏虎的锐势，完全摆脱陈腐气的文字内容，而以新颖别致的编辑形式使人耳目一新，在号称“报街”的望平街上标新立异、独树一帜。尤其及时刊发向英人争回粤汉铁路路权、抵制美货买国货、《筹拒美国华工禁约公启》、《论抵制美国华工禁约》等报道和评论文章，大长我民族志气，深受读者欢迎。胡适在其《十七年回顾》一文中对该报有过中肯的评价：“……前清光绪三十年的二月……《时报》便出版了。那时日俄战争初起，全国的人心大为震动，但当时几家老报纸，仍旧做那古文的长篇论说，仍旧保守那遗传下来的老格式与老办法，不能供给当时的需要，就是那比较新颖的《中外日报》，也不能满足许多人的期望。

《时报》应此时势而产生，他的内容与办法也确能打破上海报界的许多老习惯，能够开辟许多新法门，能够引起许多新兴趣，因此，《时报》出世后，不久就成了中国智识阶级的一个宠儿。”《时报》的销量扶摇直上，在较短的时间内就直追早它32年创刊的《申报》和早它11年创刊的第一商业大报《新闻报》，与它们形成鼎足之势，成为立足沪上面向全国发行的三大报之一。

狄平子素有“沪上孟尝”之称，交游广泛，热忱好客，他在《时报》馆楼上辟一精舍，取名“息楼”，为“同人相互交流，朋侪憩坐清谈之所”。以息楼为纽带，构成一张庞大的关系网，形成一个专门名词“息楼中人”。他们多为新学各界头面人物，拥有丰富的人脉关系和各种各样的社会资源，对政治、社会都有相当的影响力，息楼被史籍称为“革命和立宪两派人物之间意见折中的场合之一”。

### 开设有正书局

在《时报》声誉日隆的情况下，狄平子顺势开设有正书局。他独辟蹊径，把书店办得独具特色，深得世人好评。狄平子不惜重金购置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可以套印各种彩色照片和图画的印刷机器。为使印刷精良，他高薪雇用两名日本技师专门负责古画印刷并带教几名



艺徒。狄平子十分重视对古代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有正书局首创用珂罗版印名画和汉魏六朝碑刻，大量印行了珂罗版的历代书画碑帖，质高品佳，广受欢迎，流布全国，泽被后世。如其中的《三希堂法帖》等，至今仍为人所宝贵。有正书局出版各类诗书字画数量之多之纯令人叹为观止。由此获利巨大，对弥补《时报》亏损大有裨益。商务印书馆、文明书局、神州国光社及艺苑珍赏社等出版社纷纷步其后尘，相继影印书画。有正书局先后出版了善本古籍、历史名著、文学研究、佛学专著多种。有据可查的对联、字轴、画轴、画屏不下600种，各类名人书册约300种、珍本碑帖约200种，单就《中国名画集》就曾印行了38辑之多。

1909年狄平子在北京琉璃厂旧书肆购得桐城张开模“戚蓼生序本”八十回《石头记》藏本。经悉心研读，他觉得这是一个较接近曹雪芹原作的一个版本，十分难得，便在其上写了二百多条眉批，不惜工本出版了。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公开影印出版的乾隆时期的《红楼梦》，比其他诸早期“脂本”的出版早了半个世纪。如果没有这个版本的支撑，也就不会有胡适、俞平伯所开创的新红学的诞生。事实上，狄平子是民初时期第一个公开站出来批评程高本《红楼梦》的学者。他为后来的

红学研究者开辟了微观研究和修辞学研究的先河。

### 创办《妇女时报》

宣统三年（1911年），狄平子创办《妇女时报》，包天笑、陈冷血任编辑。1917年5月停刊，近六年间共出21期，为民国成立前后存在时间最长的妇女刊物。武昌起义前出3期，以提倡女子学问、增进女界知识为宗旨。武昌起义至1913年共出8期，主要内容：号召女界参军募捐，推翻清王朝；支持女子参政；呼吁男女教育平等；提倡妇女从事实业。在1914年以后的10期中，该报一方面继续抨击封建礼教对妇女的戕害，发表了冰心的《进化学上之妇人观》、恽代英的《科学家之结婚观》和《家庭教育论》等进步文章，另一方面受复古思潮影响，也发表过一些鼓吹恢复旧道德的文章。

狄平子还是维新派倡导的文学改革运动的热心参与



《妇女时报》

者。戊戌变法前一年，梁启超等人提出“诗界革命”的口号，并试作新诗。这是改良运动的需要，狄平子以自己的创作实践和理论探讨，投

入了这场革命。其代表作有《都门即事绝句》等。

在梁启超等人提倡“小说界革命”中，狄平子同样身体力行，作过努力。狄平子反对脱离现实社会矛盾去侈谈未来，强调小说要抓住现在。他的一句名言是：小说是社会之匕光也！

1939年狄平子逝世。为了国家的进步和民族的振兴，他满腔热情投身维新变法运动，义无反顾筹划参加武装起义，潜心报业改革和出版业创新，他的革命精神和创新业绩是与世长存的。



狄平子扇面书法作品

## “千军难御”的徐血儿

徐血儿，原名大裕，字天复，1891生，常州金坛人。1906年考入苏州商船学堂。徐血儿因不满清政府的无能和腐败，决定不惜以“血儿”之身来改造社会。他产生这个想法时还只有十七八岁，正在苏州商船学堂读书。课余时间，他喜欢阅读



徐血儿

带有革命倾向的报刊，如同盟会会员于右任在上海创办的《民呼日报》，不知不觉中受到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他决心做一名时代进步的弄潮儿，写下了“拼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的誓言，开始了他向往革命的理想追求。

1909年秋，徐血儿从苏州商船学堂毕业后来到了上海，前往《民吁日报》拜访于右任，要求加入该报，做一名马前卒。《民吁日报》是《民呼日报》被查封后于右任办的另一份报纸。于右任非常赏识他，便将他留在

报馆做见习生，让他先从排字校对做起，以观察他的造化。有一天，徐血儿看到送排的样稿，不知何故开着一个“天窗”，他当仁不让地干起了“补白”的活儿。他把自己先前写的名为《泣血》的文章，以“血儿”的笔名填充。于右任拿到终审校样后很纳闷，印象当中觉得没有这个稿子，经查原来是徐血儿的“杰作”。他虽不满意徐血儿自作主张，但对他的机灵和泼辣的文风还是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认为在关键时刻他能随机应变，是一块可雕琢的“好料”，于是将他调到编辑部干起了外勤记者。

但《民吁日报》好景不长，因刊登《论中国之危机》、《锦齐铁道及远东和平》等强烈抨击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东北的野心、宣传抵制日货的文章，引起了日本政府的强烈抗议。弱国无外交，创刊48天的《民吁日报》被查封了。



“民呼”、“民吁”、“民立”三报报头

于右任只得再次变换手法，于1910年10月11日创办了与前两份报纸一脉相承的《民立报》。这一次报社

队伍更强大，于右任亲任社长，聘请宋教仁等任主笔，徐血儿成了该报的重要一份子。这时宋教仁把活动中心移到了上海，与谭人凤、陈其美等组建了同盟会中部总会，把《民立报》当作同盟会的机关报，宣传革命不遗余力。与众多政治精英共事的徐血儿，心灵受到了彻底的“洗涤”，对革命事业更加充满了热情和信心，他毅然加入同盟会，成为上海报坛鼓吹革命的重要骨干。

### 握笔战斗的猛士

《民立报》作为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机关报，它能够在20世纪初成为宣传民主革命最有影响力的报纸之一，与徐血儿呕心沥血、尽责尽力是分不开的，尤其是辛亥革命爆发宋教仁离沪去汉后的一个时期。徐血儿1911年10月任主笔，1913年起，主编、主笔一肩挑。他在《民立报》影响最大的是他写的社论和政论性文章，文风锐利、立场鲜明、理直气壮，倾倒了无数读者，与“民国最牛校长”马君武、著名学者邵力子，并称《民立报》三驾马车，有一幅对联叫“千军难御血儿笔，万民欣赏力子文”。如针对当时东南各省独立，互不统属的问题，他发表了《联合机关及参议院》的文章，主张民军应尽快建立“联合机关”，组建临时政府，“为将来合众共和”做好准备，强烈呼吁建立政权已“不可缓

也”，这是同盟会内最早提出的政治主张（1911年11月11日）。他认为除了成立临时政府外，还应该设立“参议机关”，目的在于国家权力分立，用来监督政府，“作共和建立之基础”。至于民国国都地址设在武汉还是南京，他认为“择地最善者莫过金陵”，因为武汉战事正紧（袁世凯正派兵施压）不适宜，而南京地势险要，可以以长江为天堑。

针对时代变迁中的国民，徐血儿发出了强烈呼吁：“吾望同胞人人有责任心”，“今日救国之事，非爱国志士所独有之责任也，非军政府所独有之责任也，而亦吾中华民国四万万同胞所共有之责任也。”“责任心云者，非人人责权夺利之谓，乃人人尽国民一分子义务之谓也。一国之立，以国民为主体，则国民不应自行放弃其主权，而任国事之跌落。欲为新共和国民，则今后参议及监督之两大责任，所亟宜实行者”。

随着革命胜利和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成立，革命阵营内部出现了争权夺利的现象，徐血儿在《推贤让能》一文中说：“不可利禄为心，自私其位”，“名利二字，不知误了多少俊杰。果然其为大英雄，则必不为虚名虚利所摇惑。英雄爱名、爱祖国，名震世界”，若是在“名利关头”，被利所驱，就“难成伟业”，英雄留

名，靠的是政治人格和为民办事的能力，不要为了追逐名利而违背了革命的初衷。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出任临时大总统，徐血儿喜悦之心溢于言表，他在《欢迎孙中山先生归国辞》的文章中热情洋溢地说：“先生归国矣。先生屡年之惨淡经营，穷走海外，苦心孤志，独抱陆沉之痛者，竟有今日”。“先生念同胞奴隶之惨，以三大主义为天下倡，言而能行，虽挫不衰，毅魄坚志，历二十年如一日”。“先生归国矣。祝先生为国珍重，使我中华国名与先生之名齐辉也。尤祝先生以屡年经历，指导同胞为种种建设之准备”，“深祝先生为国尽瘁”。“欢迎东亚自由之神，而造福生民于无穷无尽也。”

由于徐血儿等人充满革命热情的努力奋斗，《民立报》成为辛亥革命前后革命报刊中的佼佼者，它影响了一大批有为青年，引导他们走上革命道路。如毛泽东就曾说“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的报纸”就是《民立报》，当时他还只有18岁，在长沙一所乡办中学读书。1936年，毛泽东与斯诺深情地提起了这段往事：“那是一个民族革命的报纸……充满了激动人心的材料……当时全国正处在第一次革命的前夜。我是如此地激动，以致于写了一篇文章贴在学校的墙上。这是我第一次发表政



见……”

### 与宋教仁并肩战斗

徐血儿与革命党的诸多政要交往中，情缘最深之人莫过于宋教仁。他与宋教仁的友谊是在《民立报》一起共事中逐渐形成的。1913年1月26日他在《民立报》发表了《当今之政治家》的文章，直言宋教仁是“当今第一流之政治家，而无有可以企及者也”，认为宋教仁具备沉毅的魄力和高明的手腕，提出的政治主张有着系统丰富的内涵，而且他能够坚持政见，为之不屈不挠地奋斗。反过来，宋教仁对这位后起之秀也特别赏识，他们虽然相差13岁，但志趣、政见等却没有代沟，尤其



宋教仁遇刺的上海沪宁车站

是徐血儿的刻苦努力深深地感动了宋教仁。宋教仁不遗余力地栽培提携徐血儿，把他当作自己最为信得过的朋友。1913年3月20日夜，宋教仁应袁世凯之邀北上商讨国事，离开上海时专门到《民立报》看望了徐血儿等同仁。徐血儿一路相送，结果在火车站站台上，亲眼目睹了宋教仁惨遭暗杀的血淋淋场面。他立即亲自与黄兴、陈其美、于右任、廖仲恺等一起将宋教仁送往沪宁铁路医院抢救，并一直跟随其身边，目送这颗年仅32岁冉冉升起的政治明星的生命之火熄灭。

徐血儿担心宋教仁的安危，曾不止一次地提醒过他。在“血案”发生的前三天，他的敏感察觉到有人要暗杀宋教仁，就提醒他“慎重防备”。但以政治人格立名立声的宋教仁，没有把政治与肮脏的暗杀联系起来，因而未作任何防备。

徐血儿目睹宋教仁被刺身亡的血案后，悲痛欲绝，非常激愤，他为宋教仁“抱经世伟画之政见，具利国利民之苦心”，英年早逝而哭泣，更为中华民族陷于“凄风苦雨之悲境”、“豺狼食人、遍地腥秽”、前途茫茫而泣血。才22岁的徐血儿，不知从何而来的英雄气概，到处奔走，不遗余力侦缉袁世凯的罪证。他在《民立报》上发表了最严厉的讨袁檄文《宋遁初先生昭雪

案》、《宋教仁血案》等，痛斥袁世凯倒行逆施的卑劣行径，称颂宋教仁为冲击专制献身，“可救千百万人之生”，“为子子孙孙造万世之幸福”，他的死胜过泰山之重。他还撰写了“为平民政治而死，惧独夫专制复生”的挽联告慰宋教仁在天之灵。袁世凯闻知后，暴跳如雷，派人拿取徐血儿的人头。因杀手找错了门牌号码，才使他幸免于难。

徐血儿逃过一劫后，从此格外小心，使袁世凯的心腹一直未找到下手机会。两年后的1915年，他因心力交瘁，呕血不止，英年早逝，年仅24岁。消息传出，报坛众人无不惋惜，于右任连失两位共事爱将，痛心疾首，亲书“碌碌吾徒青山又损渔父，茫茫天道黄土忍埋血儿”挽联，寄托他对“渔父”（宋教仁的字）和“血儿”的哀思，另外还专门为“血儿”赋一首哭诗：“不哭穷途哭战场，耗完心血一徐郎，九州应共冤魂语，黄土无情葬国殇。”

徐血儿的一生是短暂的，对一个人的人生历程来说，似乎是短了一点，但其甘洒热血的豪情，充当革命舆论的尖兵，永远留在了辛亥革命的宏伟历史中。

## 报界女杰陈撷芬



陈撷芬

陈撷芬（1883—1923）是近代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和新闻事业的先驱者。她率先提倡女学、女子教育、女子独立。受父亲陈范创办《苏报》的影响，陈撷芬在上海创办了第一张以女性为读者群的《女报》（后更名《女学报》，又称《女苏报》），在中国报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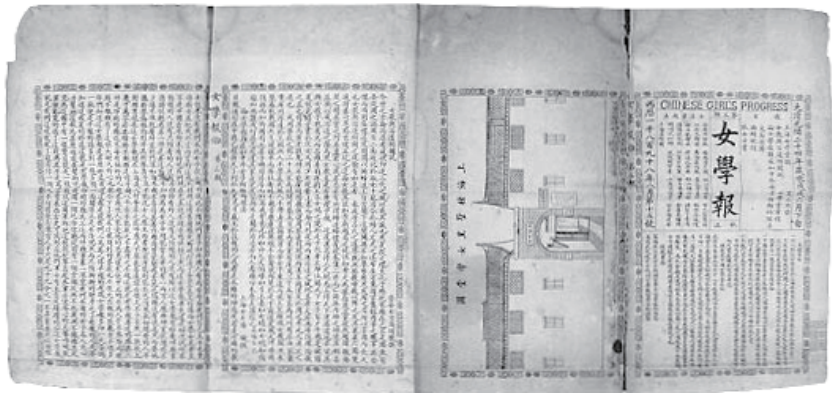
文化史上留下妇女办报的开拓性的一笔。后“苏报案”殃及《女学报》，陈撷芬流亡日本。在日本她积极参与革命活动，与秋瑾一同成为革命派中的妇女主将。辛亥革命前夕陈撷芬回到上海，大张旗鼓提出女子参政，受到孙中山的好评。

陈撷芬出生于常州十子街一个封建知识分子家庭，其父陈范从接办《苏报》开始宣传革命，试图清除社会弊政，因“苏报案”而闻名全国。有其父必有其女，陈撷芬从小深受家风的熏陶，才思敏捷，国学功底深厚，受到陈范宠爱，陈范曾以“支那女中杰，舍君复谁蹈”的诗句勉励她。

## 创办首份“女报”

陈范接办《苏报》后，陈撷芬不时也来“打横而坐”，在报纸上发表一些诗词小品之类。陈撷芬有了在《苏报》练笔和办报经验的积累，在《苏报》激进言论的鼓舞下，陈撷芬的思想也有较大的进步，她关注中国妇女遭受的不平等待遇，萌生了将姐妹们从酣眠中唤醒的念头，于是她积极筹措创办一份真正属于女性的报刊。1899年冬，上海街头出现一份内容新颖、文字泼辣的《女报》，该报刊的主编就是当时年仅16岁的陈撷芬。陈撷芬同时担任主笔，写了许多鼓吹平等、自由、独立的新闻，如《妇人政党》、《女子从军》、《女子经商》等，大力提倡女学，宣传妇女解放。这份报刊完全是以女性为对象，全面描绘女性生活、活动等多种内容，试图用文字打开妇女心智，鼓励女性成为社会活动中的一员。但万事开头难，《女报》并没有坚持多久就因稿源不足而停刊。

1902年5月8日，在父亲的协助下，陈撷芬的《女报》（月刊）在上海派克路702号复刊，由《苏报》馆代为发行。每期20页，有论说、白话演说、新闻、最新眉语、中外女界汇志、女界近史、译件、尺素、词翰栏目等。《女报》内容新颖、思想激进、形式灵活，在当



中国最早的妇女报纸《女学报》

时颇有感召力。1903年2月27日，《女报》更名为《女学报》（月刊），编辑部移至上海新马路华安里，除原栏目外，增添插画、谐译等。与《苏报》相呼应，《女学报》经常发表“激烈”文章，主张妇女解放和民族解放。所刊文章先后被多家报刊转载揄扬，甚至广东、南洋都有信函前来致意，人称“女《苏报》”。“女《苏报》”这个称呼，首先是肯定了《苏报》，同时也表彰了《女报》，一报一刊交相辉映。

陈撷芬在谈到办报刊目的时明确指出，“我这《女报》，是为了中国二万万姊妹做的，盼望我二万万姊妹，各人尽力，做事的做事，读书的读书，劝人的劝人，不到几年，我们二万万女人，就另是一个新世界”，同时她也明白“这做报的一件事，不比做文章、

做诗、做赋，只要照自己意思去做，做得好就是了。做报就不能单照自己的意思做的，要叫别人看得喜欢。劝人的话，要劝得人相信，他才肯改”。

《女学报》从发刊的那天起，除继续进行维新派妇女解放学说的宣传外，开始觉察“朝廷大官小吏”、“外人”等反动力量的作用，与当时的改良主义有了明显不同。该报刊思想倾向进步，与《苏报》同时发送，因而亦有“小苏报”之称。

陈撷芬比较注重在报刊的新闻形式上推陈出新。当时中国新闻界处于政论报纸时期，大多数报纸偏重于政论而轻时事新闻，新闻只是一些用来茶余饭后消遣的“里巷中事”。陈撷芬一反常规，在《女学报》中让新闻担任报刊的主角，刊登了不少宣传女权、提倡女学的政治新闻。翻译（译件）栏目中，主要译介西方的女子教育理论与实践，如《女子教育论》、《斯氏女德新说》、《泰西妇女近代史》以及外国女名人的传记、演说、小说等。

### 倡导妇女独立

1902年3月，蔡元培、章炳麟等人组织中国教育会。陈撷芬随同父亲等一同前往参与活动，这在当时是十分先进的。女子不仅能够出入于厅堂之外，并且能融

人到时代更替的新环境中，参与到在以往是男人才能从事的政治活动中。这时的陈撷芬已经走出原有封建家庭对女子自由的禁锢，在社会活动中发挥着女子应有的作用。

1902年“爱国女校”开学，陈撷芬成为该校第一批学生，同时在中国教育会影响下，陈撷芬在女学报馆开办了“自立女学塾”，亲自教授课程，致力于开启女智。陈撷芬并不满足于此，向往能为更多的女子服务，1903年她担任了爱国女校校长，撰写了《独立篇》、《姑息平等》、《等》、《元旦问答》、《论女子宣讲体育》、《女界之可危》、《中国女子之前途》、《尽力》等文章，提倡女子参与各项社会活动。

1903年7月“苏报案”发，《女学报》因投身反清、宣传革命受牵涉停刊，陈撷芬随父亲东渡日本。

1904年11月，陈撷芬、秋瑾与留日女生在留学生会馆召开大会，恢复女界爱国团体——共爱会。“公举陈撷芬为会长，潘英为书记，秋瑾亲任招待，使得成立一年之久的共爱会组织健全起来”。她们制定了严格的、系统的行动纲领，从宗旨、权利、义务到活动都有极为详细的规定。在陈撷芬的领导下，共爱会向国内女界倡导女子留日，客观上为将要中断的新女学实践保留了一



线余脉。

1905年，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于东京成立。陈撷芬深受孙中山女权思想的影响，成为最早加入同盟会的女会员之一。她精通英文，直接接受了西方资产阶级的天赋人权、男女平等思想，对西方妇女的社会生活有直观的感性认识，因而对妇女解放的要求显得更为迫切。在此期间，陈撷芬还积极参加留日资产阶级革命派组织的活动。为了准备武装起义，中国同盟会在横滨设制造弹药机关，聘俄国虚无党人为教授，陈撷芬与秋瑾等女士亦加入练习。

在参加反清活动的同时，陈撷芬没有忘记对女权思想和反清思想的宣传，虽然是在日本逃亡，她依然笔耕不辍。在1903年至1904年之交，《女学报》在日本一度复刊，由上海《国民日日报》代为发行。陈撷芬继续以“楚南女子”的笔名在报上发表论说和传记文学，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来表达自己的心声，她写出了《沈蓁死》、《章邹囚》等诗文，具有明显的反清革命色彩。

1911年陈撷芬回到上海。1912年3月，陈撷芬和汤国梨、吴芝瑛等各界妇女一百余人发起成立“神州女界共和协济社”，提出妇女参政要求，为女子从事社会活动和参与政事上书孙中山大总统，得到孙中山的赞赏与

支持。

陈撷芬是辛亥革命期间为女性解放作出划时代贡献的女性之一，她骄人的成绩深深地刻在历史的长廊中。她矢志不移地追求理想，最早投入到妇女解放运动和创办妇女报刊的事业中，成为一代革命女杰。

## 革命斗士何士准

何士准，字海樵，1877出生于常州一个小职员家庭。他性格豪爽、活泼，从小喜欢听塾师讲民族英雄岳飞“精忠报国”和文天祥“慷慨殉国”的历史故事。1902年江南水师学堂毕业后去上海，加入了爱国学社担任兵操教员，从事革命活动。爱国学社受《苏报》案牵连停办后，赴日本士官学校留学，参加军国民教育会，组建暗杀团，研制炸弹。1904年回国，潜入北京，寻机刺杀慈禧未成。后发生“万福华案”，再次亡命日本，加入同盟会，任黄兴的参谋。辛亥革命前夕回到常州，加入十六人秘密结社，从事革命活动。民国后任武进民政署警察所所长，1913年任津浦铁路总会计，后去广东在孙中山军政府中任职。北伐革命前，被派到江苏秘密成立江苏省国民党组织。北伐成功后任丹阳县县长，1929年任江苏省政府二科科长，1932年调入国民党党史编纂委员会从事党史研究，直至去世。

### 启迪民智新风

1903年初，何士准利用爱国学社放寒假的机会回常州过年。与同样是回常过年的杨秉铨、谢匿青、张伯伦、谢仁冰等组织了一个促进时政学习交流的藏书阅报社。所谓藏书阅报社，其实就是每个人把在外面搜集的

书报无偿地提供出来，组建一个报刊资料的公共平台，向常州大众开放。为了启迪常州民智，培养青年人崇尚革命的情怀，他们还多次举办倡言新思想的演说，除了自己演说外，还请进士出身的开明知识精英屠寄前来演讲。对常州来说，这是亘古未有的新风，席卷了整个常州城。后来蜂拥而至的听众实在太多，以致育志学堂无法容纳，不得不将演讲场所移到场地空旷的武阳公学（今局前街小学）操场上进行。

何士准在传播新思想同时还与庄仲希、蒋维乔等一批青年，发起成立了以“提倡尚武精神”为宗旨的常州最早的体育会（亦称体育传习所）。

### 筹备军事斗争

寒假结束后，何士准回到上海爱国学社，参加拒俄运动。

辛丑条约签订后，各国军队先后撤离，只有俄军毁约拒不撤走侵占我国东北的军队，并提出种种要求意图永远霸占。沙俄的野心激起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4月29日，留日学生秦毓鎰、叶澜、钮永建等人，首先在东京集会，聚集500余名留日学生成立拒俄义勇队，准备开赴东北，与沙俄侵略军决一死战。第二天致电上海中国教育会和爱国学社，要求协助。爱国学社师生立即响

应，何士准除了在张园参加拒俄群众集会外，还帮助爱国学社组建了国内第一支拒俄义勇队，担任军事训练教练，并随时准备开赴东北与俄军作战。后来拒俄义勇队又改为军国民教育会，会员有蔡元培、吴稚晖、蒋维乔、黄宗仰等96人，分成8个小分队，早晚操练兵操。蔡元培在《我在教育界的经验》一书中说，我在爱国学社“一面授课，一面与学生同受军事训练。社中军事训练，初由何海樵、山渔昆弟担任，后来南京陆师学堂学生来社，他们的领袖章行严（士钊）、林力山二君助何君。我亦断发短装与诸社员同练步伐”。

爱国学社与军国民教育会融为一体，成了当时上海爱国活动的大本营，另外，爱国学社还与《苏报》达成政治协议，由蔡元培、章太炎（章炳麟）、章士钊等社员，轮流为《苏报》撰写社论，倡导革命，《苏报》每月资助爱国学社百元大洋，用作日常开支。《苏报》倾向革命的激进言论引起了清政府极为恐慌，于1903年6月勾结租界当局，查封了《苏报》，爱国学社受到牵连，被迫解散。

随后，何士准把革命活动的地点移到了日本，他一面在日本士官学校学习，一面参加留日学生的爱国运动。

这时，留日学生拒俄义勇队被强令解散后改名为军国民教育会（与上海的军国民教育会同名）。何士准入会后结识了黄兴、杨笃生、陈天华、刘成禺、蒯若木、王伟成、张继、胡晴崖、苏鹏等人。通过与这些革命党人的接触，更加坚定了他对革命事业的信念，他与杨笃生等秘密组织了一个暗杀团，将目标对准清朝统治集团中的顽固派核心人物。

亡命日本的梁启超得知这一计划后，向他们提供了一笔经费。何士准购置了材料，与苏凤初、杨笃生、胡晴崖、周来苏、汤重希一起，在横滨偏僻的海边租了间房子，设立炸药制造所，聘请化学教授马君武为技术指导，秘密试制炸药。这时横滨发生鼠疫，警察挨家挨户进行防疫检查，他们慌乱之中将炸药倒入水缸，由于炸药的粉末不能下沉，就用玻璃管搅拌，不料摩擦过烈发生爆炸，杨笃生和苏凤初两人眼睛被炸伤。所幸水缸敞口，炸药威力不大，其他人安然无恙。

### 暗杀慈禧太后

何士准等研制炸药成功后，开始确定暗杀目标。他们认为一宫独裁的慈禧太后，是中国深陷民族灾难的罪魁祸首，因此她是首要目标。

计划确定后，何士准立即回国，与苏凤初、杨笃

生、周来苏等组成5人暗杀小组。何士准先到上海，与之前回国的华兴会核心成员张继会合一起北上。他们在天津租界采购了制造炸弹的火药、铁弹、电线、电器等材料，然后相偕赴北京，在草头胡同租屋住下，刺探慈禧的行踪。这时夏季还没有过去，慈禧正居颐和园避暑，他们乃在西直门与颐和园之间的近河道路上埋设地雷，以电线通到附近芦苇丛中，两人隐藏在芦苇里面，其他人装扮成小商小贩佯装做生意，以探视慈禧回宫的动静。可令他们失望的是，连续数月都没有慈禧返宫的消息，正值七十岁寿辰的慈禧，居然在颐和园居住达5个月之久。他们原来筹措的经费逐渐用完，无法继续在京停留，只得暂时离京再作打算。

暗杀团成员来到了上海。何士准找到蔡元培，向他介绍了此番行动的有关情况，并要求他帮忙在上海建立一个据点。

蔡元培本来就是一个坚定的革命者，他非常支持，就把位于英租界新闻路余庆里的房子提供给暗杀团，蔡元培不仅自己参加，还介绍1901年在上海首创科学仪器馆、擅长化学的钟观光、俞子夷加入暗杀团。

何士准为了扩大革命力量，又介绍章士钊加入了暗杀团，章士钊又写信给莫逆之交陈独秀来上海参加暗杀

团。陈独秀收到信后，立即从安徽怀宁赶到上海加入到暗杀队伍中。

在何士准的积极努力下，暗杀团的队伍迅速扩大，集结了一批重量级的革命先贤。

由于有了懂得化学的钟观光等人的加入，研制炸弹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炸药由钟观光、何士准研制，弹壳由黄兴、蒯若木从日本东京购置后转运过来。他们组装的炸弹，小巧玲珑，便于投掷。1905年9月24日，同盟会暗杀团成员吴樾，在北京正阳门火车站袭击出洋考察的清廷五大臣就是用的这种炸弹。

正当何士准等准备再次潜入北京行动之际，1904年11月19日上海发生了反清革命志士刘师培、万福华行刺广西巡抚王之春未遂的事件。万福华被英租界巡捕逮捕，暗杀团成员章士钊、张继等相继被捕，何士准侥幸逃脱，避走日本，暗杀活动被迫暂停。

### 参加中国同盟会成立大会

1904年11月，何士准到日本后，与亡命日本的黄兴取得联系，一起参加海外的革命活动。1905年8月20日，中国最大的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成立，何士准出席会议，成为首批同盟会会员。在会上，他结识了孙中山、宋教仁等一批革命者，受他们的影响，从





1905年，中国同盟会成立

此放弃暴力暗杀，追随黄兴组织武装起义。辛亥革命前夕，常州另一位在日本留学期间参加中国同盟会的屠元博，请何士准赶回常州，一起共谋大事。何士准回到常州，与屠元博一起组建了常州的革命核心力量——十六人秘密结社。他们把一大批要求上进的青年吸引到身边，形成了一股革命的力量，在常州即将独立的前夜，凭借强大的政治阵容，在地方举行的民主选举中独占了新政权的所有领导职务。在新诞生的武进民政署中，何士准出任武进警察所所长。

何士准没有辜负民众的重托。在新旧政权交替的社会变革时期，兵痞、偷盗现象一度猖獗，何士准毫不手

软，采取了强有力的措施进行狠狠打击，有力地维护了社会的稳定，并对警察队伍进行全面甄别筛选和淘汰，选拔一批上进青年，进行训练，充实警察队伍。

在北洋军阀统治期间，何士准前往广东，在孙中山军政府的兵工厂任职。1924年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后，他受国民党组织派遣回到江苏，与陈去病秘密成立了江苏省国民党地下组织，将全部精力放在发展国民党党员和指导各县筹建国民党基层组织上，为配合国民革命军北伐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在美国举行。何士准向中国筹备会全力推荐常州梳篦，得到筹备会的认可。他亲自将常州梳篦带到美国旧金山参展，并捧回了国际银质奖。

北伐成功后，何士准任丹阳县县长等职，后因在查禁鸦片、整顿恶势力等方面得罪了强势人物，被调入国民党党史研究部门。1934年何士准去世，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主持了他的追悼会。

## 不惜生命之贵的钱化佛



钱化佛

钱化佛（1884—1964），原名苏汉，字玉斋，常州人。早年留学日本，参加同盟会。回国后，以上海为活动中心，组织新剧社，创办亚细亚影戏公司，拍过《春宵曲》等电影，是我国第一代电影明星。

他爱好收藏，题字扇面、历朝泉币、紫砂壶、鼻烟壶、日伪告示、火花、名人墨迹等无所不收，堪称“民间收藏大师”。画画更是他的一大爱好，最喜欢画观音、如来等，所绘佛像无不神情逼真、栩栩如生，所以又叫作钱化佛。在辛亥革命中，他加入敢死队，不惜生命攻打清军，立下大功。解放后，担任上海文史馆员。一生留下了大量绘画作品，著有《中国名人画史》等。

### 勇当敢死队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上海，上海商团义勇队群情激奋、摩拳擦掌。当时阻碍革命进程的最大堡垒是江南制造局，这个局是洋务运动中创办的中国规模最大的近代军事企业，制造枪炮、弹药、轮船、机



几经改建的香港路1号亚细亚影戏公司

器，实行军事化管理，有清军驻扎。南市商团公会会长李平书出面找局总办张士珩，要求他中断清军的军械供应，张士珩不听。商团义勇队便推上海同盟会中部总会庶务部部长陈其美，组织敢死队攻打制造局。钱化佛加入敢死队，臂缠白布，参与了11月3日攻打江南制造局的战斗。

江南制造局戒备森严，在关键入口处架设了机关枪和小钢炮。陈其美因想抢头功，亲率钱化佛等敢死队员，趁天黑江南制造局工人放工之际从大门口一拥而入。总办张士珩立即下令放空枪警告，钱化佛等敢死队

员见未有子弹打来，就继续朝清军投掷炸弹往里猛冲。这时清军实弹射击，当场打死俞志伟、熊九松等4位敢死队员，陈其美被抓。李平书闻讯后，立即率领所有商团义勇军和巡警前往施救。部队绕到制造局后面，翻墙入内，在制造局工人莫宽、叶辛等配合下，占领了弹药库。总办张士珩见势不妙，带着襄办等随从，乘小轮船逃入租界，民军控制了制造局，救出了陈其美，随后宣布上海独立。钱化佛因在攻打制造局战斗中有功，受到上海都督陈其美的嘉奖。陈其美在发给他的奖状中称：自武汉倡议以来，四方响应，汉土光复。我沪滨壮士，投袂奋兴，爰举义旗，为国为民，可嘉可敬。喜今日功成，兹将调查切实出力人员，颁给奖凭，以示鼓励。钱苏汉光复上海甚为出力，经人事科调查确实，应给优等奖凭。

### 定当先锋队

辛亥革命爆发后，在南京的江南提督张勋顽固对抗革命，命令宪兵提着大刀到处搜捕革命党，遇到剪去辫子的青年就逮去杀头。钱化佛对此义愤填膺，立即加入了江浙沪联军的沪军先锋队，讨伐反动派。

江浙沪联军共有五支部队（沪军、淞军、苏军、镇军、浙军）组成，推第九镇统制徐绍桢任总司令。钱化

佛参加的是沪军，所在部队下辖3个中队。每队60人，钱化佛被编入第三中队，任司务长（仅次于连长）。部队在龙华寺集中，换上黑色制服，白边帽子，作战皮鞋，每个人的左臂上缠着一块白布，以示识别。正当部队准备乘火车离开上海开赴前线时，钱化佛的母亲焦急万分、痛哭流涕地赶到了火车站。钱化佛深知，如果这时与母亲见面，势必被亲情所困，难以脱身。为了革命，他早已置生死于度外，干脆把心一横躲了起来，让母亲熟悉的战友出面，安慰母亲说：此去并非打仗，是到苏州考察的，毫无危险，您老人家尽可放心回去，如不信，稍后可到苏州去看望儿子。他母亲信以为真，就回去了。随后，他们乘铁棚车到苏州，暂驻阊门外广济桥堍孤儿院，每天练习开枪射击，等待镇江联军总司令部的命令。每天训练完后，这帮二十来岁的青年人议论最多的话题就是如何报效国家，只要国家前途需要，什么儿女情长和事业等都可以抛在一边。

可就在这个时候，钱化佛的母亲偏偏又寻到了苏州。他没有其他办法，只得如法炮制再说一次善意的谎言。他托一起投军的同乡吴春宝出面劝母亲回上海。他母亲已经猜测出端倪，死活不肯离开，一定要见他，结果哭了一夜。第二天晚上，部队接到命令开赴前线。后

来他在回忆中不无忏悔地说：忠孝不能两全，我这一生“最对不起母亲的辛劳养育之恩”就是不辞而别，奔赴战场。

### 夜攻天堡城

张勋是清政府信得过的封疆大吏，在辛亥革命前被任命为江南提督。他统领的江南水师，下辖两个标，每标各辖10个营，还有3个精锐营由他直接指挥，统领的江防军，共有23个营，7000人，主要负责南京陆地和江岸防务。武昌起义后，他向清廷请求驰援武昌，为清廷解危，清政府考虑南京是军事重地，没有同意，要他严加防范江南。张勋便开始在南京疯狂屠杀进步力量，并



紫金山天堡城

把主要矛头对准有革命倾向的新军。

江浙沪联军的总司令部设在镇江，各路部队配备了江南制造局生产的装备和弹药陆续集中到此。11月24日，联军分三路发起进攻，镇军、沪军一路率先，在马群、孝陵卫一带与张勋部开战，经过激烈的交战，联军攻占了阵地，亲临前线督战的张勋逃回南京城中。随后，南路、北路也陆续取得初步胜利。到了11月27日，南京外围的制高点乌龙山、幕府山、狮子山等均落入联军手中，只剩下最后一个难拔的钉子——天堡城。

天堡城是南京的咽喉，位于东郊紫金山西峰，形势险峻，易守难攻，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一旦天堡城被夺，南京城就尽收眼底，可顺势而下。清军为了死守南京，在天堡城进行了重点布防。

钱化佛所在的沪军先锋队是攻打头阵的主力，11月28日晨6点向天堡城发起进攻。清军的排炮打过来，其中一发炮弹在钱化佛的头顶上方落下，他幸免于难，但队伍中一下子被炸死炸伤了10多人，随后清军的机关枪雨点般地扫射过来，钱化佛所率队员一个一个倒在血泊之中。钱化佛非但没有被吓倒，反更加勇猛，寻找有利地形，不断地向山上的清军射击。

这场战斗打得十分惨烈，清军占据了制高点，武器



精良，对仰攻的联军极为不利。革命军决定组织敢死队，谁先登上天堡城就获头功，赏大洋50块，如果在战斗中伤亡，就铸像名垂青史。200名勇士分两组绕到天堡城背面，与正面的镇、沪、浙三军同时进攻，经一天一夜战斗才登上天堡城。钱化佛在《夜攻天堡城》一文中说：“下半夜，风雨交加，一片喊杀声，夹着萧萧瑟瑟的树叶声，那真是凄厉极了……晨六时，登上山顶，两旁都是尸体，敌营已熊熊着火，铁良等已于黑夜遁逃。”

在这场激烈的战斗中，钱化佛表现得非常勇敢，他说“天堡城紫金山之役，鄙人抱着大无畏精神，猛干一番，置生死于度外，复大汉之山河，居然没有死”，这是“鄙人最难忘怀的唯一得意之笔”。钱化佛所在的三中队，俘敌二十余人，击毙六十余人，缴获机关枪二挺，手枪二十余枝，步枪二十枝，军用电话二部，令旗四面，子弹万余发，还有军衣、帐篷、粮袋、水壶等一大批军用物品。南京攻克后，钱化佛拿到了上海都督陈其美颁发的奖状和奖金。

中华民国成立后，钱化佛激流勇退，淡出政治，专事戏剧和绘画。他的革命生涯虽然短暂，但他在辛亥革命中“舍生忘死”的表现，在社会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

印象。孙中山赠送了“作如是观”、“无量佛，化佛仁者”等墨宝；黄兴把“抽刀断水水更流”的行书赠给他作留念。



钱化佛佛像作品

## 现代教育首倡者蒋维乔

蒋维乔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教育家、哲学家、佛学家，1873年出生于常州一个手工业者家庭。其父蒋树德是清咸丰、同治年间常州走街串巷的挑担银匠，因经营作风一丝不苟，在常州城很有信誉，逐渐有了一些积蓄，晚年开办了常州第一家上规模的银楼——“蒋懋大银楼”。蒋树德发现三儿子维乔天资聪颖，于是全力培养他。蒋维乔7岁入私塾，从师学习《鉴略》、《左传》、《古文观止》等，16岁时自学《纲鉴易知录》、《曾文正公全书》等，20岁参加童子试，在3000名童生中名列第十。经过科举考试，蒋维乔进入常州府学。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6月起，先后入江阴南菁书院和常州致用精舍深造，弃八股文，研究“西学”，被守旧者视为“狂生”。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南菁书院改为江苏高等



蒋维乔

学堂，该校理化教师钟观光常在学生中宣传资产阶级革命思想，蒋维乔深受教育，思想发生剧烈变化，决心致力教育的改革。因笃行厉学，蒋维乔与常州人、著名历史学家吕思勉被世人并称为“常州二先生”。蒋维乔先后担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教育部秘书长、江苏省教育厅厅长、东南大学校长等职。

### 力主教育救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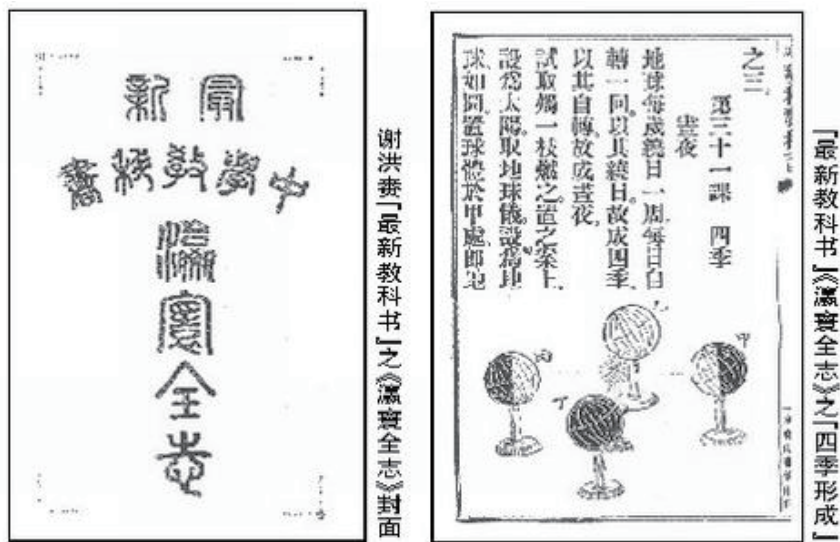
1902年中国教育会在上海正式成立。当时在南菁书院读书的蒋维乔正跟他的老师钟观光学习物理光学知识。钟观光接到蔡元培邀请他到上海加入中国教育会的电报。钟观光有些犹豫，但在蒋维乔和无锡人顾倬积极鼓动下，决定赶往上海。等他们收拾行李来到码头，夜幕降临，最后一班船已经开走了。钟观光跑去电报局给蔡元培发电报，声明入会，而蒋维乔也随之入会。

1903年春，应蔡元培之约，蒋维乔携妻、子同到上海。当时，蔡元培在上海创办“爱国学社”，附设有男女校，蒋维乔之子入男校，其妻入女校，他自己在两校任教员。爱国学社男女校自蔡元培校长在内，教员全为义务施教，当时章太炎教高班国文，蒋维乔教低班国文，课余各自以写作等维持生活，蒋维乔为《苏报》翻译日本新学以自给。那时日俄两国在东北作战，爱国

学社组织“拒俄义勇队”（后更名为军国民教育会），蒋维乔为爱国心驱使，在义勇队担任教练。是年“苏报案”发生，章太炎被捕，爱国学社被迫解散，蔡元培避往青岛，蒋维乔因目标较小，仍在爱国女校任教。1907年10月任该校校长。

面对国家的积贫落后，蒋维乔主张“救国之本还在教育”。1903年，蒋维乔进入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成为日后声名卓著的商务印书馆“常州帮”的第一人。年底，回到常州过年的蒋维乔与朋友聚会时，异常激动地向朋友宣传他在上海学到的新思想。于是这些人开始在家乡将这些新思想付诸实施，他们组织修学社、藏书阅报社、演讲会等，在春节前的常州掀起一连串的波澜。而他的这些朋友，庄俞、严保诚、许指严、何海樵、何山渔、杨秉铨、胡君复等人，也都成为日后革命时期的风云人物。

蒋维乔在上海商务印书馆用全部精力致力于小学教科书的编纂，前后达10年之久。他与中国著名出版家张元济、高梦旦、庄俞等四人，学习日本维新时期编制教科书的经验，请日本长尾楨太郎、加藤驹二及小谷重当顾问，每编一课，必经四人一致议定，然后定稿，历时两年编成《最新初小国文教科



书》，此为我国小学教科书之始。此后，又单独编辑出版《简明初小中国历史教科书》、《高等小学国文教科书》、《女子初小国文教科书》、《女子高小国文教科书》等数十种书。这套新式教材文字由简到繁，字数由少到多，内容由浅到深，插图形象生动，容易引起儿童学习兴趣，受到师生的欢迎，为全国各地学校普遍采用，这是中国小学具有系统统一教材的开始，在中国教育史是个划时代的事件。后来蒋维乔在《编辑小学教科书之回忆》一文中说：“在白话教科书未提倡之前，凡各书局所编之教科书及学部国定之教科书，大率皆模仿此书之体裁。”其实，新一代文化人都以商务印书馆

印制的课本接受启蒙，从这个意义上说，国文教科书乃是整个新文化运动真正的根基。直到今天，这批编于一百年前的教科书仍然受到众多读者的欢迎。

### 实施教育改革

蒋维乔还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大型工具书《辞源》的编辑之一。1905年，他鉴于小学师资缺乏，发起并主持由商务印书馆开办的小学师范速成讲习所，为全国各地连续培训三届师范生，并编写《最新初小教科书教授法》等多部教材。其后又主持了商务印书馆主办的尚公小学、商业补习学校、工人夜校等，并亲自任教，使教科书适应教学的需要。1910年他编著了《学校管理法》一书，被清廷学部誉为“颇多经验有德之作”。蒋维乔对我国新式教育的普及起了极大的启蒙和推广作用。在我们今天看来，可能这是很平常的事，但在一百年前小学生只知读“四书五经”的背景下，却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场教育“革命”。蒋维乔是名副其实的中国教育史上现代新式教育的奠基人之一。

辛亥革命之际，蒋维乔随蔡元培在上海。1912年中华民国政府成立，蔡元培出任教育部总长，邀蒋维乔担任秘书长。开始时教育部仅有蔡元培、蒋维乔和会计共三人。在人力物力困难的条件下，蒋维乔协助蔡元

培改革教育制度，革新教育内容，他主持拟订了《中华民国普通教育暂行办法》、《中小学制方案》和教育部官制，其主要内容有“学堂改称学校”、“初小男女同学”、“小学废止读经课”等。这是他第一次以政府名义实施教育改革，开创了中国教育的新纪元。

蒋维乔还亲自拟订了一系列教育法令，提议教育部召开全国教育界著名人士参加的教育会议，“决议二十三件要案”，并陆续公布施行。

1916年7月，范源濂重任教育部长，邀请蒋维乔回教育部任职，掌管教育法令工作。翌年元月，他与黄炎培等五人组成教育考察团前往日本、菲律宾考察。回国后，蒋维乔拟订颁布了诸多教育法令，规范了全国的教育秩序，对中国新式教育发展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 推行教育新风

1922年7月，蒋维乔任江苏教育厅长。其上任前提出：一、办事全凭正理，对各方面绝不敷衍；二、用人以人才为标准；三、经济公开；四、亲自到各县视察。蒋维乔总是带秘书一人到各县视察，预先不通知，每到一地，如有腐败作风和不称职的校长，立即撤换；对政绩出色的校长，则予以奖励。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后蒋维乔被免职。离任前，与黄炎培、曾孟朴（时任江苏



财政厅长) 商议, 将江苏省的屠宰税和卷烟税从财政厅划归江苏省教育经费管理处, 使江苏教育经费完全独立。

蒋维乔从江苏教育厅离任时, 东南大学(即今南京大学的前身, 后改中央大学) 正闹学潮, 新任省长郑谦力请蒋维乔出任该校校长。蒋到任不久, 学潮逐渐平息。时学校经费有限, 蒋维乔还是不忘延揽天下名士到校任教, 不拘一格, 不专重学历, 唯真才实学是用。

1929年9月起, 蒋维乔任上海光华大学哲学系教授、文学院院长, 他与常州同乡吕思勉及郭绍虞等名师克服困难, 共同治校。其间著有《中国佛教史》、《佛学纲要》、《中国近三百年哲学史》等, 成为大学教材。其中《中国佛教史》是中国近代第一部佛教史著作, 该书不仅对日本《支那佛教史》进行全面的梳理, 而且新增许多内容, 使中国佛教史显得更加完整。《佛学纲要》是中国现代第一部佛教知识白话本著作, 对佛教知识的普及和近代佛教的复兴, 特别是居士佛教的复兴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1949年, 蒋维乔以特邀代表身份出席苏南人民代表大会, 被选为主席团常任副主席。1958年3月, 他病逝于上海, 享年86岁。

蒋维乔在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辛亥革命前后，他几乎将全部身心致力于近代中国的教育改革；在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新教科书的十余年里，他认真总结旧教育体制的经验教训，积极参与教育改革的实践活动，研究国外先进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方法，并将其贯彻于新教科书和民国新教育制度之中，为中国教育制度的近代化做出了重要贡献。



佛学纲要



中国佛教史



中国近三百年哲学史

## 社会教育先驱伍达

伍达，字博纯，1880年生于常州。从小聪明好学，五六岁时即在父母督教下读《三字经》、《千字文》、《唐诗三百首》等。后进私塾附读，20岁中秀才。在旧学被实用科学替代的影响下，他和蒋维乔、庄俞、严练如等合请一位日本教师，学习日语及数理等科学文化。三年后，新知识大为提升，编著《最新文法教科书》和简明《乐典问答》，由上海两家书局印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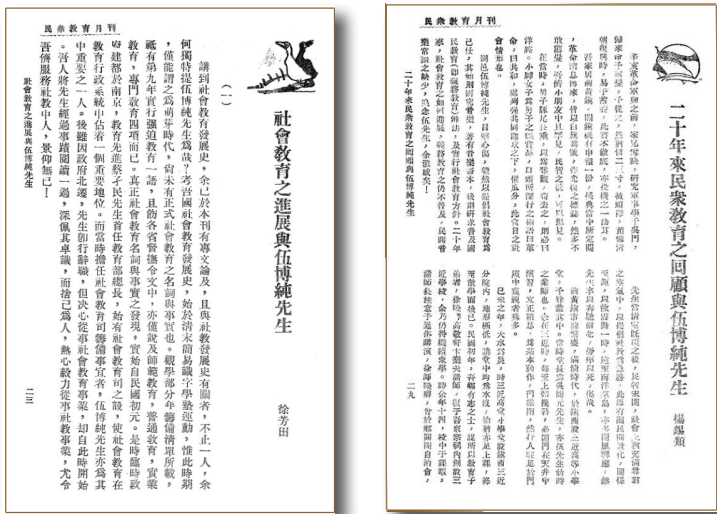
### 投身平民教育事业

1903年后的三四年间，伍达先后在桐城吴汝纶，同乡张赞墀、庄蕴宽家坐馆。他在教课之余，埋头于中日文典籍的研读，有时为上海《申报》写专论，文字流畅而犀利，这与他平日喜欢读梁启超辑印的新民丛刊有关。1905年全国立宪运动兴起，伍达对立宪运动充满了信心，在《预备立宪公会报》上发表《论筹备宪政必以改良教育为起点》，主张通过学校与社会教育达到普及教育的目的。

1908年，伍达出任武阳（武进、阳湖县）劝学所总董（即今教育局长）。在他的任内，全县增设一百多所小学，为常州初等教育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他一面抓学校教育，一面着手创建社会教育场所，在常州（包括武

进、阳湖乡区) 设置了十四处演讲所, 每晚演讲社会道德, 改良社会风俗, 崇尚节俭, 破除迷信等, 向民众灌输文化常识, 并制订实行普及教育分期办法, 上呈全省推广施行。是年冬, 伍达赴日本考察, 他一边考察日本的教育, 一边到大学听课。伍达认识到, 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国富民强, 应当归功于教育。中国若要富强, 首先须从教育入手。当时国内中小学教育已逐渐创设, 而社会教育尚无人倡导。他认为社会教育与学校教育同等重要, 应该齐头并进。因此他在考察日本期间, 特别留意日本社会教育的实施和推广办法。

1911年8月, 伍达从日本归来。后应蔡元培之邀请赴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任职。蔡元培在拟定教育部官制



1931年7月《民众教育月刊》上刊登的对伍达先生的评论文章

时，设立社会教育司，与普通教育司、专门教育司并立，使社会教育第一次在教育行政上获得独立的地位。伍达被聘任社会教育司职。伍达对社会教育事项多有谋划，盼望能迅速推广。但不久孙中山辞去大总统，由袁世凯继任，政府北迁，伍达与蔡元培一起离职。

伍达认为，中国幅员广阔，国家的建设事业不能寄希望于少数有知识能力者，更不能静待将来学生学成毕业后再有作为。目前就一些人的年龄看，已不可能接受正规的学校教育。因此要想在较短的时间内提高多数人的文化水平，只有致力于社会教育，实在无其他途径可走。伍达离开临时政府教育部后，决心绝意仕途，以毕生精力从事社会教育工作。

### 创办平民教育机构

1912年4月28日，伍达在上海和于右任、张謇、蔡元培、马相伯、吴稚晖等发起成立中华全国通俗教育研究会，成为中国社会教育事业的正式开端。该会会址设在省教育会，唐文治任会长，伍达与黄炎培为理事，具体事务由伍达主持。加入该会者有300多人。由于许多知名人士共同倡导，该会声势浩大，社会教育逐渐风行，全国先后有14个省成立分会。南洋也创办了分支机构。

随着活动的开展，伍达发现推广社会教育工作头绪很多，必须规范相应秩序和实施办法。为此，他一方面将“中华全国通俗教育研究会”改名为“中华通俗教育会”；一方面制定各种实施方案，主编《通俗教育研究录》，筹办通俗教育用品制造所。其中《通俗教育研究录》由伍达亲自编辑，每月出一期，因图文并茂，通俗易懂，颇受读者欢迎。如第三期刊登的吴稚晖为劝募爱国捐在上海新舞台唱“小热昏调”的全身照片和表演的四言唱词全文，引起读者的强烈兴趣。

### 推动平民教育活动

为了全力推进社会教育，伍达甚至动员家人参加舞台剧的表演。他认为，戏剧可用来移风易俗，是推行社会教育的一大工具，对国家、社会和人民都有益，因而带着自己的家人一起推动社会教育的发展。

民国初年，教育会各地分支会的工作，主要是设立各种补习学校，举行通俗讲演，创设阅报所及巡回文库、通俗图书馆，发行白话报，改良戏曲唱本等。各地方法虽不尽相同，但活动皆有声有色，气象万千。据庄泽宣《民众教育通论》中介绍，当时除热河、察哈尔、绥远等地外，其他各省均设有通俗教育会，且在1912年至1913年影响较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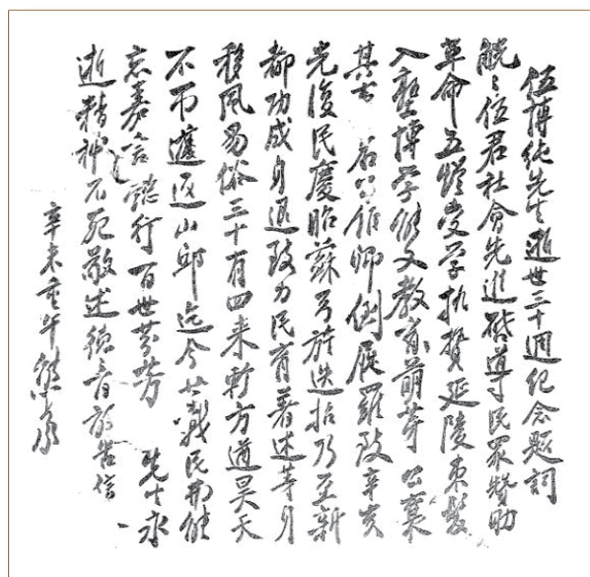
1912年，伍达当选为中央教育部临时会议议员。除负责上海总会事务外，还主持总会在北京教育部设的通信处工作。7月，伍达起草了《通俗教育设施法》，提出“注重卫生、谋生、公众道德、国家观念等四主义”，之后还被选为国会候补议员。

由于中华通俗教育会是一个人民团体而不是政府机构，会中的一切费用全靠热心人士的捐助。随着活动的蓬勃开展，会务经费越来越困难。1913年3月，宋教仁被刺，国民党受到沉重打击，很多赞助该会的社会贤达，出国的出国，消极的消极，一时无人来过问通俗教育会会事。然而，伍达仍极力苦撑着。会中原设有常务理事5人，实际负责的只是伍达一人，内外诸多事务都集中在他身上，可谓心力交瘁。

1913年春，应吴稚晖邀请，伍达赴北京参加教育部召开的临时教育和读音统一会会员会议。伍达趁北上机会，在沿途各省作宣传演讲，帮助各地认识社会教育事业的意义。到京后，伍达拜谒了在京的教育界名流，动员他们入会，鲁迅即是被动员入会者之一。数月的奔波劳累，伍达肺病复发，两次大量呕血，不得已进入日本人开设的川田医院治疗。伍达在病中仍念念不忘社会教育。病一时不见好转，而上海总会方面的函电纷至沓

来，要么“经费无着，势将解体”，要么“盼速南旋，以维残局”。伍达眼看着一手创建的中华通俗教育会陷入绝境而忧心如焚。有病不能安心医治，又不肯向朋友求助，他的病情一天天恶化，1913年9月6日溘然长逝，年仅34岁。教育界闻讯无不痛惜。

伍达是清末民初中国最早倡导社会教育的教育家和先行者，在困难重重之下以民间力量全力推动社会大众教育发展，直至付出自己的生命，为中国民众的社会教育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伍达先生逝世30周年，社会各界对他的成就给予高度肯定



## 民主革命义士朱稚竹

朱稚竹，1873年9月出生  
于常州北郊三井乡。因为家  
贫直到17岁才有机会读书。  
他读书异常用功刻苦，白天  
在田间劳动，傍晚步行8里到  
城里读夜书，深更半夜才回  
家，后来考上秀才，还中了  
优廪生。1905年，朱稚竹积  
极参与教育改革，在家乡长  
沟村捐资创办乔荫两等小学  
堂，办学成绩显著，获政府  
赠匾额嘉奖：“乔荫学堂，  
成绩优美，延誉遐迩。校长  
朱稚竹君，热心教育，特给匾额，以资鼓励。”



朱稚竹六十岁画像

当时常州府中学堂监督（校长）屠元博兼任全县劝学所视学，经常到各乡巡视考察，同时物色有理想、有变革思想的进步青年知识分子，吸收到常州府中学堂教书共事。屠元博在日本留学时曾加入中国同盟会，思想比较激进。他发现朱稚竹是个难得的优秀人才，就与之结交，并于1909年聘其为常州府中学堂庶务长，主管后

勤工作。在屠元博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下，朱稚竹迅速成为地方革命力量的主要骨干。

### 参加秘密结社

1909年4月，朱稚竹担任武进教育会副会长，与屠元博一起当选为江苏咨议局议员。1910年8月，两人又被选为江苏咨议局常驻议员。1910年8月，朱稚竹发起成立武阳农会，推屠寄任会长，自任宣讲员。当时常州有城、乡两派势力，屠寄、朱稚竹代表乡派。朱为了与恽祖祁为代表的城派抗衡，利用农会名义，组织农团，招收青壮年授以刀棍枪法，以备调用。屠元博以学生练习兵操为由，呈准两江总督酌发旧枪。朱稚竹与兵操教员刘百能同往督署，领到金陵制造局制造的120枝带有刺刀的快利枪，令学生轮番操练，掌握枪法。

根据形势需要，朱稚竹与屠元博发起组织十六人秘密结社。他们以“打倒官绅，与各地革命党联络，团结地方有识之士，推翻清政府统治”为宗旨，成为常州地区革命的指挥中心。朱稚竹任这个秘密团体的总干事，负责与上海、苏州、南京等地的革命党首领接应联络，设计筹款。

革命的秘密活动地点主要在府中学堂、农会、敬节外堂（十子街），其中常州府中学堂是最重要的活动场

所，成为事实上的大本营。当时，朱稚竹等人计划革命分两步走：第一步打倒官绅，同时积极争取有革命倾向的人士；第二步，与各地革命党联络，推翻清室。

### 策反江苏巡抚

武昌起义后，各省响应，纷纷独立，唯独江苏省毫无动静，常州革命党人决议派朱稚竹前往苏州抚署打探动向。

程德全是清朝江苏巡抚、朝廷重臣，朱稚竹是信奉孙中山民主革命的革命党人，两人素昧平生，政见各异。要和这位位高权重的人物打交道，可谓安危莫测，是要冒杀头危险的。但朱稚竹心里还是有底的，因为他知道程德全是一位颇具胆识之人，曾任黑龙江省齐齐哈尔的副都统，后升任黑龙江将军。1900年庚子事变，帝俄入侵时，他曾单骑入俄营议和，大义凛然，临危不惧，坦言“帝俄如欲用兵入侵，钢炮车当从我身上碾过”，浩然正气，威慑强敌，议和得以事成。任巡抚江苏期间，也能注重民教，不以民众为草芥，具有爱国爱民的意识。

朱稚竹到苏州后，首先争取到同乡承远轩的帮助。承远轩是焦溪镇人，毕业于江苏警官学堂，时为抚署幕僚，深得程抚的赏识。他勇敢机智地在革命党与程德全

之间穿针引线。

程德全对当时的政治态势，亦有洞察，他认为过去的所谓“造反”，都是利用宗教迷信蛊惑人心，目的仅是想推翻旧朝换新朝。而中山先生革命则不同，有思想，有主义，有方针，有政治纲领，追随者大多是有识之士，犹如黄花岗72烈士那样都敢为理想牺牲生命，并得到众多海外华侨、国际友人的支持。但他又囿于传统忠君思想，想成为一名名垂青史的忠臣。两种思想交织在一起，矛盾重重，所以他只能抱着“君子从容天地间”，以静制动，静坐以观。

朱稚竹一波三折的进入到抚署里，与程德全交谈于密室之中，几经推心置腹的协商争执，终使程德全深明大义，从善如流，相约于11月5日与苏州、常州等地方各府同时起义独立，革命形势由此迅猛发展起来。江苏独立后，程德全自任都督，民国元年（1912年）他兼任南京临时政府内务总长。

### 协助成立常州军政府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正在南京出席江苏咨议局会议的朱稚竹得到消息后，立即于10月12日赶回常州。他召集结社成员刘伯能、吴樵长、段孟陶、傅越济等骨干开会商议响应计划。

会议决定屠元博、朱稚竹分头去上海、苏州，与陈英士和抚署接头，了解革命形势。同时吩咐刘百能等联络近城德泽、循理、依东、安东、怀北、孝仁、丰西、安尚等八乡的农团300余人到城内，以防范盗匪、安民和维持秩序为名，到府中学堂集合待命。

屠元博和朱稚竹从上海、苏州得知行动时间后，即回常州部署起义工作。

11月3日和5日，上海和苏州先后独立。11月7日，屠元博等通知教育会、农会及商会三法团到局前街原先贤祠（今局前街小学内）县教育会开会。会上推选屠寄为武进民政署民政长，朱稚竹为总务课长，并决定于次日通电全国。屠元博宣布了江苏都督程德全6日发出的常州军政分府司令何健的委任状。

傍晚，屠元博等人将何健从火车站接到府中学堂。当晚，城派代表恽祖祁不甘示弱，命令江防营将府中学堂西面的校门和北墙围住，并在校门口点燃炸药包，枪击围墙。何健命校中农团散伏于楼下，准备迎击。由于江防营不了解府中学堂内部情况，又听说革命党人近日来往运输枪炮炸弹藏于校中，因而不敢贸然进攻，结果相持到天亮，不得不撤离。

11月9日，苏州发兵至常州，由营长朱熙率领驻扎

于府中学堂。全城遍悬白旗，屠元博、朱稚竹等革命同志领导农团三百余人，借校中快利枪列队拥护何健司令至旧府署就任军政府司令职。聘屠元博任参谋长，朱稚竹等任顾问。常州军政府正式成立。

### 改组国民党武进分部

1912年4月21日，朱稚竹与屠元博在十六人秘密结社基础上，联合各乡组织公民同志会，朱稚竹、屠元博为会长。同年8月，征得多数会员同意和国民党本部许可，公民同志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武进分部。朱稚竹、屠元博分别任正副部长。从此，朱稚竹专事党务，积极办理省会、国会选举。1912年12月22日，武进共和党、国民党竞选民国第一届国会众议院议员，国民党朱稚竹和屠元博、杨择三人当选，成绩为全省之冠。朱、屠、杨当选国会第一届众议院议员后到北京任职，参与制订宪法。

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强行解散有国民党身份的议员，朱稚竹弃职回常州。1916年第一次国会恢复，朱稚竹复任议员。1917年段祺瑞掌权，孙中山高举护法旗帜，南下广州成立非常国会，朱稚竹千里投奔，支持孙中山先生的护法斗争，参与选举孙中山先生为非常大总统。

朱稚竹先后任两届国会议员，还担任国务院谘议、广东军政府参议。朱稚竹曾两次荣获孙中山先生颁发的三等大授嘉禾章和二等宝光嘉禾勋章。

1959年4月，这位常州地区的著名民国元老病逝于北直街123号长沟别墅，享年86岁。《辛亥革命江苏英烈录》记载了他的革命事迹。



长沟别墅

## 常州光复第一人屠寄

屠寄，原名庾，字敬山，1856年生，常州人，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社会学家。1892年中进士，历任工部主事、黑龙江舆图局总办、京师大学堂正教习、奉天大学堂总教习、淳安县知县等职。工诗词、骈文，长于史地之学，尤长于蒙



屠寄

古史。著作有《蒙兀儿史记》（160卷）、《黑龙江舆地图》、《黑龙江舆图志》、《京师大学堂中国史讲义》等。

1911年，屠寄从外地回到常州，以其极高的社会威望，担任武阳教育会会长、武阳农会会长，团结地方革命势力，积极响应辛亥革命，领导了常州光复的斗争。此后，被公推为武进县民政长。

### 倡言社会改革

1902年冬至1903年春，蔡元培等在上海发起成立中



国教育会和爱国学社，以举行演说会等形式宣传革命。其主要成员蒋维乔、陈范、汪文溥、陈撷芬等都是常州人，他们与屠寄取得联系，在常州开展活动。

1902年秋，自南京水师学堂回到家乡的何海樵，与杨秉铨等在育志学堂（原新坊桥小学）组织藏书阅报社，公推屠寄为总理，并集合同志到社演说，后组织常州演说会，其宗旨为：养成爱国思想、振兴教育、劬正谬俗。屠寄经常亲自到会发表演说，他结合当时形势，从国家如何“救亡图存”讲起，强调国家要富强、首先要开启民智，当前的迫切任务就是兴办学堂。后来，常州演说会的演说活动逐步走向社会，举办广场演说、家庭演说。

在常州演说会的大力倡导下，常州于1903年5月10日成立了妇女“不缠足会”，以“专救将来，广为劝导”为宗旨，呼吁妇女放脚。

屠寄为谋求女子独立，身体力行，提倡女学，于1904年创办争存女子初等小学堂，1906年添办师范班。1909年，与粹化女校合并，取名粹存女校。

在这些活动中，集合了一批关心国家的前途和命运，致力探索救国救民真理的觉醒了的知识分子，逐步在常州形成了一个新的政治派别，人称“新派”。后

来，因“新派”主要是以屠寄为会长的农会骨干为核心，也称“乡派”。

常州演说会宣传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打击了封建势力，为开展武装斗争、光复常州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 领导常州光复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11月初，上海、苏州宣布独立。常州方面，屠寄等组织近城的德泽、循理、依东、安东、怀北、孝仁、丰西、安尚等八乡农会团丁，于6日、7日进城，散驻各街市维持治安。

革命党人在与上海、苏州联络的同时，积极筹划组织常州军政分府。11月7日，县商会、县教育会、县农会在局前街先贤祠（今局前街小学）开会，屠寄当选民政署民政长。

当晚，屠寄与江苏都督委任的常州军政分府司令何健等在常州府中学堂开会，部署第二天各项工作进程：由农团通知各团体、商民悬挂白旗，宣告常州光复；拍发电报通电全国；由农团护送何健司令至府署就职。

当天半夜，地方武装江防营围攻常州府中学堂，意在将革命势力一网打尽，夺取常州地方政权。

当时，屠寄设法离开，越过学校围墙登上城墙，但



常州府中学堂

跳下时不幸足部受伤，不能行走。刚好有天宁寺收租船停在护城河边，僧人将屠寄送到天宁寺方丈室。方丈治开借给川资，雇了小船，将屠寄送到东横林，换乘火车至苏州治疗。

11月9日，常州全城悬挂白旗，宣告光复。同日，常州军政分府正式成立，武进、阳湖两县合并为武进县，屠寄任民政署民政长。

### 推进民政新事业

常州光复后，屠寄扶伤返回，到任视事，本着革命精神努力推进民政事业。

民政署在号召自动剪发的同时，派人把守主要路口，剪去男子的长辫子，清除清朝统治残留在人们头上的标记。接着，又大力宣传女子不缠足的主张，使之家

喻户晓。

为启迪民智，民政署创办报纸《新民日报》，社址就设在民政署内。版面安排，第一版为社论与时评，第二版为电讯，刊登各地光复消息。

民政署组织清理公款公产委员会，由审查委员将公善堂所有卷宗账据分别造册，交县议会登记复核。

此外，民政署在扫除社会陋习、严禁城乡烟赌、创办游民习艺所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社会风气为之一新。

辛亥革命激发了中国人民经济建设的热情，以屠寄为首的民政署在这种热情推动下，对常州的经济建设提出了规划：一是提倡机器辟水，计划从芙蓉圩入手，预计20匹马力机器30台，可使芙蓉圩消除水灾。二是建筑道路干线，一条南通太湖、一条北达长江。当时已派员查勘路线并详细制定预算，约需二十万元。三是建筑圩塘码头，计划在圩塘江口开辟商埠，供上下水江轮停泊，使江北及沿湖各地物产于此集散，繁荣商业。四是请求划拨东仓官地，开办农事试验场。

虽然这些计划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全部实现，但是，在屠寄领导下，常州的建设还是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1912年7月，火车站前新丰街筑成，时称“新筑路”。9月，武进市董事会创设电话局，次年1月正式通话。

辛亥革命后，常州的教育事业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一是大力兴办小学；二是为培养小学师资，创设县立初级师范，校址设在东岳庙，俗称东门师范；三是资助常州府中学堂附设高等实业科。

中华民国成立后，常州府中学堂改称江苏常州中学。由常州军政分府拨银2000元，重行修葺校舍，于1912年4月1日开学。

江苏常州中学除中学、简易师范班外，并得到武进县每年一万元的资助，附设高等实业科，科目有农科、土木工程科、实用化学科。一年后，高等实业科经费困难，于1913年1月停办，部分学生由武进县资助，赴日本留



常州北塘河边屠寄铜像

学。高等实业科虽存在不到一年，但在常州教育史上仍不失为了一件大事，它开创了常州高等教育的先河。

1912年11月17日，屠寄辞去民政长职务。1913年，屠寄拒绝袁世凯政府武进县知事的任命。屠寄虽然辞去了职务，但他始终为家乡人民操劳。1919年，在北京大学国史馆供职的屠寄应常州地方公推，遥领武进县志总纂。1920年，屠寄再次回到家乡，又担任武进县水利总董、武进县积谷总董和武进县红十字会首任会长。为消除常州北门水患，担任北塘河工局总董，筹款开河，次年4月工程完工。

1921年8月15日，屠寄在租住的常州麻巷吴氏中丞第去世，享年66岁。

## 后 记

《辛亥革命中的常州人》是继《影响中国的常州人》之后常州人系列的第二部。全书立足于大众化科普读物定位，着眼于常州地域范围，挖掘了一批辛亥革命期间，为推翻封建统治、创立民国作出过重要贡献，有全国影响的常州人，着重记录了他们在舆论营造、武装斗争、创立民国等重大事件中发挥的历史作用。

本书的编写得到了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得到了全市有关党政机关、高校、新闻单位的积极支持和配合。市委书记范燕青为本书作序，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徐纓主持指导本书的编撰。丁一、汤继荣、周晓东具体负责本书的策划、设计和统筹工作。

全书共分十八章，池银合撰写赵凤昌、吴稚晖、吴殿英、陈范；顾敏琪撰写庄蕴宽；宗清元撰写吴介璋、汪文溥、孟森、孟昭常、徐血儿、何士准、钱化佛；臧秀娟撰写狄平子、陈撷芬、蒋维乔、伍达；钱月航撰写朱稚竹；张浩典、陈蕾撰写屠寄；邱燕萍参与部分内容的写作。黄青萍、杨欣、田子玲、池银合、叶舟、薛焕炳、张浩典、宗清元为本书提供了大量历史图片资料；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凤凰出版社也对本书出版给予了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由于各种原因，本书在内容、形式等方面仍难免有一些不尽完善的地方，恳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编者

2011年8月





